

# 邁向後「文明的衝突」時代，開啟地球文明新紀元

裴勇

國家宗教局政策法規司政策研究處處長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跨越千年的鐘聲仍然在人們的心頭迴盪，世人仍然沈浸在進入第三個千年的興奮和喜樂之中。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大廈，卻在九一一這一天遭遇恐怖分子的襲擊，頃刻間灰飛煙滅，化爲烏有。塵埃雖已落定，但人們卻驚魂未定，心中的恐怖和迷惘久久揮之不去。怎麼辦？人類文明將走向何處？恐怖分子精心選取了九一一這個帶有警報涵義的日子實施恐怖襲擊，是要挑戰和警告美國。但同時，九一一事件本身也成爲我們全體人類的警世鐘——他告誡我們「文明的衝突」以及任何形式的暴力衝突的不斷升級將把人類引入歧途，在現有人類生存環境下，將提前將人類推向萬劫不復的死亡之境。人類必須認真客觀地釐清衝突的真實根源，尋找各種現實的解決方案，化解文明間的衝突，重整世界秩序，開啓地球文明的新紀元。

## 一、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威脅

這個星球演化並養育了人類，然而人類的「文明」卻在相對極短的時間裡把美麗安寧的世界弄得支離破碎、亂象叢生，製造了足以數百次毀滅地球的殺生武器，產生了無數次血腥恐怖的野蠻衝突和戰爭。這就是人類創造出的文明嗎？走到今天這種境地，面對這樣一種殘酷的生存現實，人類應該向何處去？這個脆弱的世界無法繼續承受任何形式的污染與破壞，無法再承受任何形式、特別是暴力的對抗和衝突。在當今世界，我們以何種理念，用何種實踐來處理國際關係、文明際關係，都必須把人類現時面臨的生存威脅作爲一切行爲的出發點和背景。這是當前人類處理一切問題，討論任何未來發展必須考慮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

自從歐洲工業革命以來，每年人類都在消耗碳載體在地球五十萬年歷史中積累的能源。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總 IEA 曾發布的西元二千年世界能源展望[註 1]中預估，在西元一九九七年到二〇二〇年間，全球主要能源的需求將有五七%的增長，也就是每年都有平均二%的增長。很不幸的是，全球各種蘊藏的能源卻存量有限。根據估計，全球的原油存量將在四十一年後枯竭殆盡，天然氣是六十三年，煤礦也只有二百一十八年。此外，早在一八九〇年左右就已經有人擔心，煤燃燒的副作用——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可能導致全球變暖。然而全球變暖已經成爲現實。據統計，近一百年來，整個地球的年平均氣溫上升了攝氏〇・七度，

而大城市的平均氣溫上升了攝氏二—三度，如東京市區的氣溫竟上升了攝氏七度。全球變暖對環境的破壞包括土壤沙化、水資源減少、化肥使用增多，農業成本增高、環境嚴重污染、生活質量下降等。而且根據國際氣候論壇一九九二年發表的調查報告即指出，世界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達二百一十億噸，並呈上升趨勢。不斷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遠在我們用完這種能源之前就將使我們這個星球面目全非。全球暖化是個足以導致人類從地球滅絕的嚴重問題。在能源問題上人類已經陷入兩難境地，按人類現有發展模式，如果繼續瘋狂使用碳類資源，不但資源很快枯竭，而且環境災難將使人類滅絕；但如果沒有清潔無害的替代能源，人類也將無法繼續生存。然而，我們仍在繼續超量消耗碳類能源；在我們尋找替代能源時，首先找到並已付諸使用的卻是核能。美國著名科學家卡普拉早在一九八二年在其《轉折點》[註 2]一書中指出：

核動力作為一種能源來使用，是絕對愚蠢的，它超過了大規模耗用常規能源造成的生態影響，不但毒害千萬年以來的自然環境，甚至要滅絕全部人類。核動力代表著一種技術走向不可收拾的最極端的例子。

核動力主要指核武器和核反應堆。核武器的潛在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核大國的核武器擁有量就足以使我們的星球被毀滅幾百次。同時，核擴散也在不斷加劇，而製造一顆原子彈只需十到二十磅的鈹，一座核反應堆每年可生產四百至五百磅鈹，足夠用於製造二十至五十顆原子彈核技術與核原料的獲得並不是很難。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不斷增多，謀求獲得核武器的國家也越來越多，未來核衝突的爆發可能不獨自取決於核大國。如果任何武裝衝突的升級導致了核武器的濫用，人類文明將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對核能的潛在危害，人類在認識上並不是十分清醒，或者作為和平利用原子能被提倡，或者一些利益集團以飲鴆止渴的方式掩蓋其危害。實際上，核能不是安全清潔的能源。核事故造成的核滲漏危害人們健康、放射性物質嚴重污染環境。以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泄洩為代表的核泄洩事故頻繁發生。同時，在核能生產的整個過程中都有放射性物質逃逸到環境中，不斷積累，持續對生態系統產生影響，很難從根本上將之處理掉。核廢料處理是一個棘手問題。據統計，截至二千年，有總量一·五十二億加侖具有強烈放射性的「高標準」廢物，而軍用放射性物質精確數量是保密的。這一切都是潛伏的生態災難。

此外，人類當前還面臨著疫病流行的問題，而且變得越來越突出。愛滋病（AIDS）雖然仍在蔓延，但當前人們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新近出現的流行性疫病上來，像羊瘙癢症（scrapie）、瘋牛病（BSE）、口蹄疫（FMD）和去年二〇〇三年在亞洲和北美引起巨大恐慌的非典型肺炎（SARS）以及時下在亞洲正在傳播的禽流感（bird flu）等等。這些疫病的產生尚未找到非常確切的原因。但通過種種跡象表明，這些疫病的產生，很可能與人們目前的

飲食消費方式、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有關。由於商品生產的特徵決定，只有迅速擴大產量才能獲得利潤最大化。對於畜牧業而言，禽畜養得越多、長得越快就會賺到更多的錢。比如，自然狀態下的雞生長期通常為十四個月，而以工業方式飼養的肉食雞，成熟期只有兩個月。要想達此目的，就只能在飼料加入大量化學添加劑。為了讓家禽多長肉，飼養者就大量餵食「催肥劑」；為了讓牛羊多產奶，就在牲畜體內注射含有雌性激素的「催奶劑」；為了讓果菜早熟上市賣個好價錢，就過量噴灑「催熟劑」等等。而激素催生的家禽和催熟的果菜，既破壞了肉、菜、果的營養成分和口味，又通過食物鏈把激素傳給人體，危害身體健康；同時，也污染了土壤、水質、空氣等環境資源，貽害無窮。更有甚者，有些飼料破壞了禽畜的飲食結構和習慣，自然狀態下牛只吃草，如果加入動物類的飼料，特別是加入有害的死亡動物的飼料就可能出現問題。科學家們猜測，瘋牛病的發生就可能是因為牛吃了患有搔癢症的羊所製成的飼料造成的。除了飼料問題外，由於工業化的生產，致使大量禽畜擁擠在狹小陰暗不通風的環境中，增加了細菌和病毒的滋生和傳染。據有關專家分析，環境因素是誘發禽流感的主要原因，如雞群的密度過大、通風不良、應激因素頻繁等[註 3]。

當前人類面臨的生存威脅既有環境的威脅，也有生存方式和制度的威脅；既有現實的威脅，也有潛在的威脅。全球氣候變暖、環境污染、資源匱乏、能源短缺、疫病流行、心理失衡，消費主義泛濫、饑餓、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其導致的貧富懸殊及隔閡和仇視的加重等，這些都是顯見的現實威脅。人類面臨的最大的潛在威脅，一是核擴散及使用核武器將導致的生態災難，一是世界觀上的迷誤，這將不斷引發人類私欲的膨脹與行動上的混亂和盲目。如果人們的觀念不及時轉變，潛在的威脅就仍將不斷變為現實的威脅，最終釀成苦果。如此惡性循環下去，人類將提早面臨滅頂之災。

## 二、文明與衝突

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著名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寫於一九九三年，其後他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為全面的論述，形成《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這部專著，於一九九七年出版。

自從他提出了「文明衝突論」後，或許是因為其理論影響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對外關係的政策與實踐，或許當前的國際關係態勢彷彿成為其理論的註腳，當今世界各種形式的衝突——種族紛爭、地區戰爭、恐怖主義襲擊等等此起彼伏，始終不絕，由於陷入衝突的各方具有不同文明背景，似乎冷戰後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是一個「文明的衝突」的時代。到底是否真正存在一種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呢？還是這只是一種虛構和暗示。文明衝突論一問世，即受到廣泛關注和諸多質疑，各國觀察家和學者普遍對該理論作出各種評論和批判。

在討論文明與衝突的關係之前，首先應該明確文明和衝突各自的涵義。「文明」，按亨廷頓的解釋，「是一種文化實體，村落、區域、族群、民族、宗教組織，所有這些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獨特的表現。文明之間是通過歷史、語言、文化、傳統及最重要的宗教區別開來。不同文明的人在神人關係、個人與群體、公民與國家、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以及權利與責任、自由與權威，平等與特權等方面有不同的觀點」[註 4]。這裡，文明的概念是十分寬泛的，他幾乎囊括了人類生存的方方面面。一般而言，當我們提到「文明」一詞，在我們的頭腦中首先出現的就是在世界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文明，不同意味著有差異存在。「衝突」一詞，基本涵義是「抵觸、爭執、爭鬥」[註 5]，「因爭執而互鬥」[註 6]。從詞義看，它是貶義的，與其相對的詞應該是協調、一致（accord, harmony）。衝突是一種暴烈的、野蠻的非理性的解決方式。但差異不意味著衝突，也不必然導致衝突，面對差異，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決方式，一種是通過對話達致和解、協調、一致；一種就是衝突。當亨廷頓說「差異不必然意味著衝突，衝突也不必然意味著暴力」[註 7]時，他是對的。但當他接下來又說，「諸世紀以來，文明間的差異卻引發了最持久、最暴烈的衝突」[註 8]時，在細微處出現了不易發現的歧義。並不是文明間的差異引發了衝突，而是人們對差異的錯誤態度引發了衝突。這只能說明，人類在面對差異、解決差異中，缺乏理性、容忍和智慧。文明中的負面因素、文明中的不文明因素起到決定性作用，最後引發了衝突。因此，單純是文明的差異並不能構成「文明的衝突」，關鍵取決於差異各方對待差異的態度。亨廷頓把衝突中文明及文明間的差異等因素大大泛化了。

其次，我們談論亨廷頓「文明的衝突」這個假說，離不開其所處的年代——上個世紀九〇年代。可以說，文明衝突論是亨廷頓在那個特定時代產生的一個錯覺。他認為，當時世界政治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從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後，即九〇年代初開始，儘管民族國家仍是世界事務的最有力的因素，新世界的基本衝突源已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經濟因素為主，文化因素佔據最主要的位置。文明的衝突將成為未來的戰爭線。文明間的衝突將成為現代世界衝突演化的最新階段。整個九〇年代所發生的國際衝突從表象上看，好像都是文明的衝突。前南斯拉夫各民族國家間的種族清洗、波黑內戰（編按：波黑即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 之簡稱）、海灣戰爭、巴以衝突、科索沃戰爭、北愛衝突、車臣戰爭、印巴衝突等等，直至延伸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九一一事件及反恐運動、印尼巴厘島爆炸案、美國對阿富汗實施軍事打擊、莫斯科人質事件、美國進攻伊拉克等等彷彿成為亨氏理論的實驗場。每一場衝突背後都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使得這些衝突的持續發生非常容易讓人們相信真是「文明」引發了「衝突」。但即使我們姑且承認有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存在，也不存在所謂的文明的衝突成為世界政治的新階段。因為歷史上，不同的文明早已存在，差異早已存在，不同文明國家間的衝突也早已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不同文明之間發生衝突就是文明的衝突，那麼「文明的衝突」由來已久。歷史上的文明差異與今天的文明差異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何以言新？亨氏本人在〈文明的衝突〉文中就提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文明的衝突」的始末[註 9]，只不過，他認為那是中世紀的「文明的衝突」，還不是近代國際關係理論上的「衝突」，那時，西方還沒有出現民族國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世界政治」。民

族國家的衝突——意識形態的衝突——文明的衝突這種亨廷頓的衝突演化模式只是從近代講起。其實，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並不是國際衝突的新階段，只不過是衝突的一種新表現。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以前是爭奪土地和人口，現在是爭奪能源控制權等。冷戰結束後，之所以衝突不斷，集中在一個時段頻繁出現。主要原因是因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略平衡被打破後，主要是東歐各國家和各種力量重新進行整合。必然出現暫時的混亂和衝突以及隨著意識形態的失效各國向傳統文化的復歸。文化再認同伴隨著衝突，彷彿衝突完全成爲文明的衝突。此外，大國因地緣政治考量的介入其中，增加了衝突的複雜性。但文明因素更多是衝突的加強和催化因素，關鍵還是生存空間（能源、資源等）的爭奪。

再次，亨廷頓認爲，未來最重要的衝突將發生在七或八個主要文明的斷層線上，這些文明是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可能還有非洲文明。在這八個文明中，實際上可以進一步概括成基督教文明、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天主教、新教爲核心的西方文明，與斯拉夫東正教文明雖有不同，但都可歸入基督教文明。在現實中，更多的衝突是西方國家與伊斯蘭教國家之間、東正教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之間的衝突。西方國家與東正教國家之間的衝突雖有，但主要還是基督教文明內部傳統衝突的新表現。日本文明雖有自身的獨特性，但廣義上仍屬儒家文明下的亞文明。日本與周遍國家的衝突，日本與美國的衝突，文明因素並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仍是日本因國土狹小、資源匱乏，而需要拓展生存空間。在西方國家海外殖民以前、以儒家文明爲核心的中華文明從未因文明的因素主動與其他文明發生過衝突。反而對各種文明及作爲文明核心的宗教虛懷以待，顯示出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氣量。特別是在唐朝，各種外來宗教，無論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等等都進入中國，而沒有發生文明的衝突。在穆斯林國家對南亞次大陸擴張以前，印度教文明也沒有主動與其他文明產生劇烈的衝突。即使中國、印度遭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後，被迫與西方發生衝突，但也不是因文明差異產生的衝突。因此，幾大文明在衝突中的角色是不同的，幾大文明對待文明差異的態度也是不同的。

文明的差異雖然存在於多種文明中，但文明的衝突並不是普遍的。此外，亨廷頓還通過假想把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組合在一起，作爲抗衡西方文明的力量聯合。但這不過是各種力量已達到顛峰狀態的西方國家害怕失去優勢而產生的一種妄想症，他們不但要樹立假想敵，還要把假想敵拉到一塊，想把所有文明都拉入衝突中。他們把遊離於衝突之外的一種主要文明的力量增長看成是一種巨大威脅，中國威脅論就是這樣產生的。事實上，以文明、宗教因素爲背景的衝突並未泛在於各主要文明間。這種衝突仍然主要集中在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之間，集中在文明衝突的傳統區域。最新的表現就是二〇〇三年三月的美伊戰爭以及持續到今天的美國對伊拉克的佔領。但即使這種衝突，雖然有重要的文明因素在內，但基本的、決定性的因素絕不是文明的或文化的，而仍然是地緣戰略因素和經濟因素，對美國而言，要繼續在軍事、政治、經濟上保持戰略優勢和對世界能源的控制權。

### 三、衝突的內在的、真實的根源

作為一種觀察國際關係的角度，從文明的維度觀察國際關係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它不過是觀察問題的一種範式，不但說明不了衝突的真正根源，還可能掩蓋衝突的真實原因。正如美國參議員哈奇（Senator Orrin G. Hatch）在一次關於宗教問題的研討會上所指出的，「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的理論只是一個有用的理論範式，但並不足以解釋衝突產生的實際原因」[註 10]。不同的文明顯然在各個方面存在著差異，但差異不必然產生衝突。引發衝突的根本原因首先就是利益，如果進一步向深層挖掘，爭奪利益的背後是私欲、自大、偏見、軟弱、強迫、缺乏信任、不容忍等一系列人性的弱點在文明交往中的暴露，是人類文明中的負面因素、不文明因素引發了衝突。其次，人類在差異面前缺乏理性的態度，在尋求建設性解決問題方式方面能力低下。最後，衝突最深層、最內在的原因是在這個世界上佔主導地位的人類對世界的觀察和認知方式的謬誤，現代科技的不斷發展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正是這種認知方式不斷走向極致結出惡果的表現。人類現有的發展模式與人類的理想是互相背反的，人類用以標榜自身智慧和能力的現代化產物所證實的卻是人類對世界和自身的無知。

### （一）衝突的利益因素

簡言之，一個國家賴以存在的要素是領土、人口及領土範圍內的資源。這是任何國家發展經濟、維持生存的的必要條件。自古以來，任何國與國之間的衝突首先都是利益之爭，多一塊領土就多一點生存空間，多一些人口就多一些勞動力。地緣相近的各國如果力量相當、處於平衡狀態，可能相安無事。一旦某國力量增強，均勢被打破，因擴張而產生的衝突就可能隨時出現。但應注意，這裡只是可能，並非所有大國、強國都必然會對外擴張，文化觀念不同會導致意志和行為的不同。文明或文化相同的國家會產生衝突，文明或文化不同的國家也會產生衝突。文明差異也許會加強衝突，但決不是文明差異決定衝突，而是利益決定衝突。一般而言，衝突是由一種強勢文明挑起，或者由強勢文明為保持優勢故意在其他國家或其他文明間製造或支持衝突。但是否任何時代的強勢文明都必然要挑起衝突？也不盡然。關鍵要看那種文明抱持一種什麼樣的世界觀。西方文明是當今世界的強勢文明，在歐洲工業革命以來的三百多年間，西方文明衍生出來的現代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在全球一直佔有統治地位，在今天仍然被多數發展中國家作為標榜和範式。

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代歐洲各國之間衝突和爭鬥。當時，對於西方來說，國際關係基本上等於歐洲各國之間的關係，亨廷頓認為，威斯特伐里亞現代國際和平體制出現後的一個半世紀西方世界的衝突主要是在國王和皇帝、君主專制和君主立憲之間進行的，目的是擴張其官僚統治、軍隊、商人經濟實力和疆域。就是在這個進程中，他們創建了民族國家，並且從法國大革命開始主要的衝突線從國王間轉為民族國家之間。這種十九世紀的衝突模式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除了日本以外，非西方文明國家大多只是作為西方殖民主義對象的歷史客體，而無法成為國際關係的主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非西方文明國家紛紛獨立，真正的全球意義上的國際關係方開始存在。[註 11]

在三百多年來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過程中，由於對殖民地的爭奪，西方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擴散和延伸到非西方文明國家，幾乎到達世界每一個角落。今天，非西方文明國家之間的衝突大多數都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後遺症或西方製造的產物，印巴之間的克什米爾爭端、兩伊的南部邊界問題、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分離、中東以色列猶太復國運動等等無不是西方人前仆後繼打下的衝突楔子。文明之間並非因為差異就必然會產生衝突，文明的衝突不是泛存的。

歷史表明，當今世界所謂文明的衝突實際上是西方文明挑起的衝突，或者是西方文明在各文明間製造或催化出來的衝突。西方為維護其戰略優勢和利益，保持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領先地位，把其他任何一種可能對其形成抗衡力量的文明作為其潛在或現實的威脅，因此，「綠禍論（伊斯蘭國家威脅）」和「黃禍論（中國威脅）論」在西方甚囂塵上。亨廷頓甚至在他的文章中杜撰出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之間的聯合抗衡西方文明。其主要論據是說中國向伊斯蘭教國家輸出核技術、銷售武器，但他的論據很難被證實。美國渲染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始終沒有找到確鑿證據，然而巴格達已經被佔領。實際上即使中國真的銷售了武器，也無法證明所謂儒伊聯盟的存在。因為美國向很多國家售賣武器，也包括伊斯蘭教國家，難道就因之存在美伊聯盟？這不過是西方妄想狂和歇斯底里的發作，不然就是它故意製造出威脅的存在，為其擴充軍備提供支持。文明的衝突是虛構的，歸根到底還是利益的衝突。美國今天可以為對抗蘇聯而支持阿富汗，明天會因為塔利班反對美國而藉口對其實施軍事打擊；今天支持世俗主義的伊拉克與原教旨主義的伊朗爭鬥，明天就可以因薩達姆不服而對其窮追不捨必置其於死地而後快。難道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的基督教文明與伊拉克的伊斯蘭文明沒有衝突，而與伊朗的伊斯蘭文明有衝突？難道美國的基督教文明昨天與阿富汗的伊斯蘭文明沒有衝突，今天卻又有了衝突？原來文明的衝突的標籤是能夠為所欲為的強勢的西方國家可以予取予求的東西，一切不過是赤裸裸的利益。

## (二)衝突的觀念因素

這裡的觀念因素指的是衝突的最深層的因素，即人們的思惟方式和對世界的認識問題，或者說是世界觀的問題。東方和西方有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我們這裡以東方的中華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為例加以說明。簡單的說，主流上中國人的世界觀，對人與自然的關係採取一種整體的、有機的世界觀，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不能截然分開的有機整體，即通常所說的「天人合一」的觀念。而西方人的世界觀儘管在古代（至晚在西元一五〇〇之前）也是有機的整體的，但在思惟方式上，從古希臘時期就潛存著對象性的思惟方式的因素。十六世紀以降，歐洲的文藝復興包括對古希臘文化的復歸，當然不是單純的回歸，而是將古希臘文明中的某種趨向發揮到了極致，形成了近代以來西方世界觀和價值體系的基本輪廓，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不但在西方，而且在全球成為一種強勢文化，成為其他文明國家自覺或不自覺、主動或被動加以仿效的對象。這就是：

對象性思惟方式，即將整個世界（包括人自身在內）作為一種外在的對象進行研究，將認識的主體與客體截然分開，相互對立，這就是主體與客體的二元性。在認識的過程中，他們將對象進行分解、定義，形成概念，進而應用邏輯推理形成理論體系。各種複雜現象都可以用支離分割的方法來理解。基於此模式的對象性思惟過程，必然強調對物質世界的結構分析，其得到的理論體系必然是確定的、客觀的、重實證的。這種理論體系必定是概念清晰而明確，推理嚴密而符合邏輯。

對象性思惟為人類的物質文明發展作出巨大了貢獻，但同時，這種觀念的極度擴張和強勢存在，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甚至有些現代西方哲學家把人類不斷擴張的物質文明比作地球上的惡性腫瘤。這幾乎是其必然的發展規律，是隱藏於主客體的對立之中的必然結果。簡單的說，在這種傳統中的西方人看來，人與自然是分開的，自然界只是人類的對象，人類面對的自然界，資源是無限的，是可以無限擴張的，人們可以採取控制和掠奪的方式，盡情地去開發自然，征服自然，以驚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資源，排放大量自然界無法吸納的廢棄物。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指引下，產生了西方現代科學，引發了歐洲工業革命，其後西方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勢力極度膨脹，大大強化了西方人對西方文化的優越性的認同，也強化了對落後的其他文明國家的說服力，於是，在這種強勢文化的宰制下，全球都掀起了工業化的浪潮，對自然的全方位的掠奪在全球展開。然而，人類的欲望本來就是無限的，如果觀念上認為，人與自然可以截然分開，自然界是可以無限開發的，那麼這種欲望就會極度膨脹，一種盲目追求物質享受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就會成為主流。

然而，自然界並不是自外於人，自然界的資源也是有限的。為滿足強大的無限的欲望，對有限的資源就必然產生爭奪，最根本的衝突由此而來。這樣一種西方的思惟方式和世界觀，特別是其近代產物的過度擴散，成為今天全球產生各種人類災難性問題的最深層的原因。這種掠奪對生態和人類的生存是致命性的威脅。在近代以前，由於科技尚不發達，任何一場戰爭或擴張對生態的破壞還不很明顯，無論是十字軍的東征，還是伊斯蘭帝國的南擴，還是蒙古大汗的西進，自然界還可以進行自癒性的恢復。在近代以後，特別是當前隨著代表西方利益的經濟全球化的展開，這種西方文明因其強勢存在而進一步在全球擴展，人類在加速向滅亡的深淵邁進。

### (三)衝突的心理因素

雖然迄今為止不同的人都從自己認為最重要的範疇出發，給予文明不同的界定，但在這所有的定義之中，共同之處還是有一點的。每當我們提到「文明」一詞的時候，我們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她的反義詞「野蠻」。一般而言，所有的定義都是把文明作為蒙昧和野蠻的對詞來使用的。「文明」豈能產生衝突，如果人們都按文明的法則行事，衝突何來？一切「文明的衝突」，其實都是「野蠻的衝突」。衝突的種子深埋於人性之中，人性中野蠻性、動物性、惡性、即人性中弱點的浮現是構成衝突的心理因素。這些人性的弱點主要包括：強加於



人、偏見、自大、互不信任、自私、不容忍、崇尚暴力。國家之間、文明之間的衝突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這些人性弱點的集中爆發。

也許每一種文明都堅信自己的文明比別的文明更具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人們對自己的文明具有堅定的信念本無可厚非，但文明間以「同情地理解」的心態去認真瞭解對方則顯然不夠。於是某些文明一方面對其他文明產生偏見，同時對自身產生盲目自大和妄自尊大。偏見產生蔑視和憎恨，自大產生欲取而代之的想法。在國家或文明之間保持一種力量均衡時，衝突一般不會發生，大家暫時可相安無事。如果一旦均勢被打破，某種文明成爲強勢存在，強加於人的想法就有可能因爲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強大而成爲現實，衝突就會產生。弱勢的一方、被強迫的一方必然要進行抗拒，而強勢的一方、強加於人的一方則必然會訴諸武力。在當今世界，世人有目共睹的是，十六世紀以降西方基督教文明逐漸發展壯大，在整個世界居於主導地位，這個文明創造了於今流行於世的社會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模式。特別是從這種文明生發出來的科學技術，使西方世界自信基督教文明是世界上最優越、最先進的文明。他們要把他們的文明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經濟和軍事能力的強大，西方開始了將其文明強加於人的進程。其文明，特別是宗教的傳播就是伴隨著其在全球的殖民擴張而全面展開。強迫輸出文明與強迫輸出革命一樣都必然引起被強迫者的強烈抗拒。不但無法心悅誠服地接受這種文明，而且必將埋下持久衝突的種子。

#### 四、世界觀的轉變

在人類當前面對自身製造的生態危機、面臨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的緊要情勢下，人類世界觀的轉變儘管是被迫的，但別無選擇。我們必須主動加快觀念的轉變，重新調整人類的交往方式和發展模式，拯救我們的地球家園，拯救我們自己。在對世界的基本觀念上，我們必須放棄或者重新定位西方文明中的對象性的思惟方式、機械論、還原主義，我們必須回歸到古老的整體世界觀，或者推陳出新，創造出新的整體的、系統的、有機的、生態的、平衡的世界觀。時至今日，我們應該更清醒地看到，我們掠奪自然界，就是掠奪我們自己。我們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三百多年來對整個世界起支配作用的西方文明對世界基本看法及其實踐，是今日生態災難和人際疏離的主要原因。實際上從上個世紀初以來，很多西方哲人就已經看到的西方文明的深層病因。「西方的沒落」、「西方中心論的終結」、「解構邏各斯中心主義」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對西方文明的危機或深層病因進行了分析批判。從現實層面看，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是西方文明的恥辱，也是人類的悲哀。工業化導致的資源耗盡、生態危機、殺人武器的膨脹和擴散，都無不突顯了西方文明過度的消費主義、暴力傾向、對自然巨大的破壞力等反文明特性和暗藏的騰騰殺機。上個世紀六〇年代以來，西方有識之士就在呼籲西方文明應走出危機，實現轉折。

一九六八年，正當工業國家陶醉於戰後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隨之而來的「高消費」的「黃金時代」時，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困境的報告」——《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

出世。來自西方不同國家的約三十位企業家和學者共同探討了關係全人類發展前途的一系列帶根本性的問題，並對原有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質疑，從幾個方面闡述了人類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產業革命以來，經濟增長模式給地球和人類自身帶來的毀滅性的災難。有力地證明了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不但使人類與自然處於尖銳的矛盾之中，並將會繼續不斷受到自然的報復。該書還指出「改變這種增長趨勢和建立穩定的生態和經濟的條件，以支撐遙遠未來是可能的」，而且，「為達到這種結果而開始工作得愈快，他們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註 12]

上個世紀八〇年代，美國學者卡普拉[註 13]出版了《轉折點》（Turning Point）一書，他認為，西方社會面臨危機，其深刻性和全面性是前所未有的，各種社會問題是同一危機的不同表現，因而無法通過局部調整來解決。同時，危機又不是無法度過的，世界末日不會來臨，人類還會繼續進化，出路在於實現西方整個文化的根本轉變。以大衛·格里芬為代表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者也對西方文明產生的問題與危機進行了深入剖析，並著重探尋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方案。[註 14]然而，儘管呼籲的聲浪不絕於耳、不絕於世，但直到進入新的世紀、新的千年、直到今天轉折仍然沒有全方位獲得實現。但是，危機在加深，危險在加劇。人類必須在轉折點上向前邁出重要的一步。而首先，全人類都必須共同調整觀念、轉變觀念。我們之所以首先著重強調西方文明的轉折，是因為這種文明不但潛存著最大的危機，而且於今仍在世界上居於統治地位。如果它繼續一成不變地向未來推演，繼續帶著先天的缺陷獨步天下，世界的危機將持續成倍加深。但同時，我們必須認清：我們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絕不是鼓吹另一個世界中心的出現，去建立中華文明中心論、印度文明中心論或阿拉伯文明中心論等等新的形形色色的東方中心論。任何的「中心論」都會導致狂妄自大和不可一世，最後閉目塞聽，走向衰敗。昔日的中國就曾經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以中央之國、天朝大國自居，結果在近代走向衰落。今日的美國已把自己看作世界文明的中心，把自己所發揚的西方文明作為普世價值，把自己的每一步都看作是帶領世界前進的腳步，卻渾然不知自己將把人類引向何處？「亢龍有悔」、「物極必反」，美國如果按照現有的心態和道路走下去，其衰落將不可避免，目前端倪已經出現。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任何一種「中心論」都是褊狹的。實際上仍沒有完全擺脫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陳舊觀念。中國著名學者季羨林老先生曾經提出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東西文化關係論，認為二十一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頗遭詬病。後經季老闡釋調整為「東西文化互補論」，更具合理性。[註 15]

人類已經進入新世紀，隨著科技的進步，交通工具和通訊技術的發達，特別是網路的出現，縮短了人類之間的時空距離，使人們更容易超越國家和文明的界限，去理解整個世界。「地球村」已經是不爭的現實，「世界共同體」具有了現實可能性。徹底拋棄各種「中心論」（包括人類中心論），建立以全球觀念為主要特徵，全人類新的世界觀的時刻已經完全到來。

新的世界觀絕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她必然基於人類現實的生存條件和生存狀態，以現存的世界各種主要文明傳統為基礎，取長補短，融會貫通的結果。這種新的世界觀最首要的內容，就是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人類應該採取一種整體的、系統的、有機的、平

衡的世界觀，必須明確而充分的認清：人與自然是一體的，人類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過度消耗或濫用資源將使自然環境和生態遭受破壞，其惡果將反作用於人類，最終使人類喪失生存空間，被剝奪生存權利；儘管人類的欲望是無限的、複雜的，但人類必須採取有效的辦法，節制欲望，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基於放縱欲望而產生的過度消費的生活模式是一種罪惡，應該被徹底放棄。務必使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達致平衡。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也是互相依託，不可分割的關係。在人類社會，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反文明、反人類的。自由競爭法則在人類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條件下是有限度的，而且必須以維持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為前提條件。否則進步成為倒退，創造成為毀滅。任何以鄰為壑的交往方式和發展模式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今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達國家將污染嚴重的產業都轉移到不發達的國家，致使技術落後的不發達國家繼續按傳統產業發展模式進行開發，持續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然而，環境和生態是無國界的，TMD（Theater Missile Defense，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和 NMD（Nation Missile Defense，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也許可以攔截導彈，但發達國家用什麼攔截環境污染的轉移呢？而且發達國家的所積累的財富儘管離不開自身的智慧和勤勞，但其財源卻無疑來自對世界各地的劫掠和盤剝，以及由此而建立的有利於發達國家、使其不斷暴發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些都構成了不發達國家持續處於貧窮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貧困和貧富懸殊的加大，使貧窮國家為解決眼前的窘迫很難從長計議，謀求可持續的發展，終將導致對環境和生態破壞的進一步加劇。不合理的國際體制、為滿足欲望對資源無休止的消費形成惡性循環。以西方為主的發達國家捨本逐末的發達史昭示：劫掠自然與劫掠他人，與自然衝突，與他人衝突的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人類必須互敬互愛、互相幫助，互相謙讓、共存共榮。共同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全球文明。歸結起來，新的世界觀應該主要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是一體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人類之間應該加強合作，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人類應該謀求一種動態平衡的發展，堅持適度、可持續的原則；東西方各種文明互有短長，應該實現優勢互補，共建全球文明，實現全球一體化。

## 五、實現全球一體化路線圖

在繪製路線圖之前，必須首先明確「全球一體化」的概念。自二十世紀末葉以來，世界上最流行、最廣泛，也最模糊的名詞就是「全球化」。這裡所說的「全球一體化」與時下流行的「全球化」概念截然不同。「全球一體化」是指基於人與自然、人與人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的觀念，在人類處於一個共同的資源有限的生存空間情況下，應該按照生態的、平衡的、適度的、可持續的原則開創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按照和平、和諧、合作、互補、互利的原則開創新的國際交往方式，從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謀求人類共同發展、實現全球共同繁榮。全球一體化中的「一體」既是指全人類和整個自然界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也是指人類的發展應該總體規畫，共同發展。這裡所說的「全球一體化」與時下流行的「全球化」或「經濟全球化」的概念不同點在於：

1. **觀念基礎不同**。前者是從全球觀念出發，從人類生態現實出發，建立在整體的系統的世界觀的基礎上，可以說在觀念上是後現代的[註 16]。而後者貌似全球觀點，實際上仍以西方中心論或者西方傳統思惟方式為觀念基礎，可以說在觀念上是前「後現代」的。

2. **發展模式不同**。前者充分考慮了人類的生態現實，堅持生態的、平衡的、適度的原則，謀求共同發展；後者是在西方利益集團主導下，仍然堅持盲目的自由競爭、通過擴大需求刺激增長，謀求發達國家最大利益的傳統原則。

3. **交往方式不同**。前者強調要建立平等互利合作的交往方式，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後者仍然保持現有的不合理的，而且經常會引發各種衝突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4. **追求目標不同**。前者旨在通過整合人類文明成果，提昇人類的整體生存質量，通過謀求人類共同發展，走向全球共同繁榮，實現共贏，從而實現全人類的最根本利益。而後者旨在謀求保持西方傳統優勢，建立西方控制下的世界秩序，尋求西方國家的單邊利益。

從這裡所說的「全球一體化」和現時的「全球化」或「經濟全球化」概念的根本區別可以清楚地說明為什麼在當今世界有很多人反對當前的這種全球化，不但發展中國家及人民反對，在發達國家也有人反對，而且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和界別的人士。一九九九年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在美國西雅圖舉行，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數百個非政府組織和五萬多抗議者舉行了聲勢浩大遊行抗議活動，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其後，反全球化活動頻繁發生，幾乎沒有間斷，年年都有新熱點出現。魁北克、熱那亞、達沃斯、阿格雷里、華盛頓、約翰內斯堡，直到二〇〇三年九月六日世貿組織會議地墨西哥的坎昆，抗議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反全球化陣營所反對的，其實並不是資訊與知識的全球化，而是貨品與資本的全球化，是當今主要國際組織及發達國家政府主導下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所造成日漸擴大的貧富鴻溝、環境摧殘、社會崩解、衝突不斷、戰亂頻仍。他們認為，控制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的，就是「沒有靈魂，只重利潤」的跨國公司，因而主張要挽救「利潤掛帥」勢力蹂躪下的地球。真正的和平與社會正義不可分，必須提出新的和平與正義理想，創造新的國際體系。

「全球化」一語並非全新的概念，早在十五世紀新大陸發現後，地球被歐洲幾個殖民主義強權國家瓜分，各國先後被吸納進以西方文明和西方利益為中心的全球化市場之中了。現時流行的「全球化」沒有任何新意，不過是舊全球化的延續，只不過經過重新整合，改變了形式。近一個多世紀來，經歷了德、美、日的崛起，以及共產主義的興衰、殖民帝國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形成，乃至晚近東歐與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原本分立的各個不同集團紛紛融入西方跨國經濟體系。這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為核心，以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為基礎，透過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加上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衍生出來的法律、條約、協議和基本原則等國際建制，以全球為範疇的共同市場逐漸形成。然而，這種全

球化的發展，是導致國際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西方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俱佔盡優勢，由於在議題的設定、資源的集結、創新的能力上佔有優勢，可以予取予求，其揮霍資源的惡果，卻要那些沒能享受到好處的弱者來承擔。佔了九成人口的貧弱小國，無法介入國際治理規範的制定，資本難以形成，人權不被重視，環境遭到破壞，資源提早耗竭，在無知與無奈中變成富國所操縱的市場和廉價勞力與原料的供應地，其發展受到人為的阻礙。以致富者愈富，強者愈強，南北差距日趨擴大。這樣的全球化缺乏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只是代表了西方發達國家、代表了某一文明的單邊利益，而且這種強勢文化所暗含的反文明、反人類特性時刻威脅著環境和全人類的整體利益，自然要遭到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另一種世界是可能的」[註 17]，這裡所主張的「全球一體化」，就是要把可能變成現實。只有建立新的世界觀、實現全球一體化、才能真正地結束各種衝突、在地球這個有限的空間裡實現人類真正的平等、民主、和平，才能實現人類超越自身的局限，獲得真正的精神提昇，最終獲得真正的自由與解放。如何實現全球一體化、走向真正的世界大同，需要我們共同找尋方向、探索道路、繪製出一幅行之有效的路線圖。

### (一)政治

#### 1. 必須使美國結束不顧全球共同利益的單邊主義，並成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文的結論「對西方的涵義」[註 18]部分表示，他的理論不是希望文明發生衝突，他只是對未來可出現的文明的衝突作出描述性的假設，即使這個假設存在問題，也必須考慮其對西方政策的涵義。接下來，他以一個謀士的口吻爲西方獻計獻策，他建議西方內部及親緣文明國家要團結起來，遏制其他文明，特別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發展和強大，維持其現有地緣優勢，加強反映西方利益的國際組織，製造並利用其他文明間的矛盾，維持並加強西方現有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維護西方的利益。不難看出，他所描述的文明衝突論，出發點並不是如何化解衝突，找到解決衝突的方案，而是站在東西方對立的角度上，爲西方國家繼續靠維持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保持強勢存在出謀畫策。

亨廷頓的觀念和理論都是前「後現代的」。儘管在文章的最後，他也提出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其他文明，努力找到西方與其他文明的共同點——「未來的世界是一個不同文明組成的世界，沒有一種文明是普世文明，每一個文明都要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表面上看，也許他是自相矛盾的，但其目的更多的是爲了西方保持強勢和優勢的戰略意圖能夠順利實現而不得不對如何與其他文明相處加以考慮，而不是真正地出於希求各文明平等相處共同繁榮。沿著亨廷頓的思路下去，必然是美國單邊主義的出現，必然是美國對單極世界的追求、對美國治下的和平的狂想。

美國現行的國家政策有極大的可能使美國成爲實現全球一體化的障礙，既不能實現美國的根本利益，也不能給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與發展。冷戰的結束，並沒有給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而是一種冷和平，而且還連續不斷地發生著地區性的熱戰。以美國爲首的西方發達國

家難辭其咎，他們為保持西方文明的領先地位，在政治和經濟上對其他文明、其他國家的壓迫是當今世界持續產生衝突的根本原因，甚至某種意義上，恐怖主義也是由這種國際壓迫催化而生的。近來，美國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場合表現出不負責任，藐視全球公共利益的行為，為了本國公司的利益拒絕在旨在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上簽字，為了建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而撕毀〈反彈道導彈條約〉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是其推行單邊主義的具體表現。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日，布希政府公布了它的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以下簡稱〈文件〉）[註 19]。〈文件〉的基本內容體現了布希政府以單極主義為核心的「新帝國主義」的戰略思想。〈文件〉中明確出現了「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Peace）提法。強調美國有責任維護世界和平，其實質是指美國對世界的統治。九一一之後三天，布希在講話中說，「美國對歷史負有責任，這一點已經很清楚了」，為此必須確保我們是世界頭號強國。〈文件〉中的新帝國主義戰略是這些提法的系統表達。其內容包括維護單極世界，徹底消滅恐怖主義，實施先發制人，裁定別國主權，輕視國際條約、國際組織和國際準則等。認為只有最大限度地增強美國的實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安全。〈文件〉認為進攻是最好的防衛，「美國治下的和平」旨在長期維護美國在全世界不可挑戰的領導地位和「前所未有和無與倫比的實力和影響」。「我們的軍隊將強大得足以使任何潛在敵手放棄企圖通過某種加強軍事實力的措施來超越或與我們的軍事實力抗衡的想法」。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完全控制太空，確保絕對的核武的優勢。

作為核大國、第一軍事強國、將進攻作為戰略首選，美國意欲何為？未來對世界構成最大威脅的既不是中國，也不是伊斯蘭國家，卻越來越像美國。中國威脅論、伊斯蘭威脅論不過是西方的障目法，真正有能力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是美國。只有美國威脅論才有現實的基礎。布希政府以「美國治下和平」之名行新帝國霸權之實的國家安全政策，對人對己都是不負責任的。不但對於美國充滿著危險，對於整個世界都充滿了危險，他無疑要將美國塑造成一個窮兵黷武、狂妄自大的戰爭狂。面目猙獰的第四帝國的形象已初露端倪。然而美國的狂想終歸只能是狂想，是注定不可能實現。

古往今來，戰爭狂從來沒有獲得過真正的成功。美國的確是當今第一強國，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會經歷由弱到強，盛極而衰的過程。所謂「亢龍有悔」、「物極必反」，美國一時盛極，很可能就是他開始走向衰落的開始。所謂「天要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美國越瘋狂，離滅亡就越近。美國政府的新帝國主義論對世界、對美國都是不負責任的。然而，對於美國來說，一切都不是不可挽回的。但這需要美國徹查人類生存的現實，及時轉變觀念。羅蘭威廉曾說過：如果有人懼怕我們，我們永遠得不到安全。只有戰爭才能產生戰爭，創造敵人。窮兵黷武不能使美國更安全。美國若想真正捍衛自己的原則和利益，成為世界的領導，應該是在人道的意義上，而非戰爭的意義上。不是通過軍事行動，而是通過人道的行動。引領世界往人道人性的方向發展，而非領導世界走向戰爭。人類生存的嚴酷現實需要美國這個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成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他必須放棄單極主義、新帝國主義的安全政策、必須放棄狹隘的西方文明中心論，尊重其他文明，控制自己的私欲，尋求和解與合作，靠道義的力量贏得尊重與信任。這樣美國才有可能成爲真正的世界領袖。美國在觀念和行爲上作出調整不但對其他文明、其他國家有利，而且是最大的實現自身的根本利益，也將是人類真正的福音。

## 2. 必須實現國際平等和全球民主才能實現真正的世界和平和人類自由。

平等、民主、自由是人類共同追求的永恒價值，絕非是西方文明所獨有。然而平等、民主、自由從來沒有真正地廣泛地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過。西方國家把這些價值作爲專利留給了他們自己，並將之狹隘化。因而弱化了他們對全人類的意義。「在一國內實現的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只有民主在全球實現，才有真正的民主。在舊殖民時代，在西方眼裡，非洲人是奴隸，印第安人、土著人是野蠻人、亞洲人是偶像崇拜者，他們要不就該被奴役、要不就該被滅絕、要不就該被控制。平等、民主、自由是不能被加諸其上的。在新帝國時代，在西方看來，他們需要輸出平等、民主、自由，但是他們的目的卻不是真正希望造福於其他文明國家的人民，而是要使他們西化，以西方文明統一天下，進而牢牢控制住他們，獨佔世界，獨享單邊利益。一旦其他國家真正因實現民主而變得強大，他們寧願其退回到專制，只要獨裁者對他唯命是從。一位美國總統的話是一個典型例子，「我知道他是個畜牲，但他是我們的畜牲」[註 20]。中國著名美國研究學者王輯思教授認爲：

美國的對內民主和對外霸道總體上是相輔相成的。觀察美國的人不難發現，這個國家的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表面上十分矛盾：前者倡導權力制衡，後者主張美國獨霸；前者強調人人生而平等，後者否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張法律高於一切，後者經常無視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前者擯棄政治鬥爭的暴力方式，後者動輒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等等。其實，國內民主制度給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行爲提供了有力支持。對外霸權行爲可以通過民主制度獲得其合法性。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是在國會某種認可後發動的，於是便取得了在美國政治中的合法性，或曰戰爭得到了國會的「授權」。[註 21]

這種西方內部的民主、平等、自由不是真正的民主、平等、自由，是極其有限的。民主、平等、自由不能廣泛在國際間、文明間實現，就只能有國際壓迫和國際剝削，而不會有國際公正、世界正義的出現，就不可能實現人類真正的和平。

國際關係的良性發展，最首要的是在各國間實現真正的平等。一種文明強迫另一種文明接受其文明，一個國家在事關生存的經濟發展問題上壓迫另一個國家，只能增加仇恨、累計仇恨、引發弱者的絕望、製造非理性行爲的不斷產生。美國在受到九一一恐怖襲擊後只顧採取復仇的行動，或者繼續為地緣利益和經濟利益而採取軍事行動，而不去探詢引發恐怖主義的真實根源，實際上除了冤冤相報，引發更大的衝突之外，根本無從解決恐怖主義的頑症，只能把自己和世界引向歧途。解鈴還需繫鈴人，美國應該慎重反求諸己，轉換思惟方式，重新審視根本利益所在，看清自己對世界的責任。平等的觀念必須首先被建立起來。並在這個基礎上創造全球民主的模式。在美國頗具影響的建設性後現代主義代表人士大衛·格里芬就提出要建立全球民主政府<sup>[註 22]</sup>的構想，如何建立需要進一步探討，但實現全球民主無疑是未來新世界的前進方向。大衛·格里芬教授認為主權國家是現代政治產生罪惡的根源，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深刻的見解，但並不是絕對的。主權國家的世界觀、與其他國家的交往理念如果符合文明的法則，實際上遠離罪惡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當代的國際環境下，主權國家的存在是必不可缺的。因為非主權化在理論上雖具洞見，但現實中會被新帝國主義者利用，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旗號下，為了單邊利益去干涉別的國家。除非國際環境成為後現代的，才使非主權國家化有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礎。

全球民主在當前並不適合建立一個取代主權國家政府的全球民主政府。即使我們把全球民主的體制稱做全球民主政府，也應該是具有較強國際約束力的國際聯合組織，他是由主權國家組成，但理念和目標與以往不同。全球民主機制的建立可以充分考慮到人類生存的真實現狀，把人類發展模式和交往方式建立在一個理性和符合實際的良性循環的基礎上，真正去實現人類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全球民主的建立，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可能的。科學的不斷發展，交通和通訊技術的極大提高，使得人們能夠更快捷、更廣泛地溝通交流，更深入地增進不同文明的瞭解和理解，更容易對整個世界的現狀和全球問題的癥結所在產生理性的認知並達成共識。全球民主機制的建立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它的建立也就是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最現實的方案就是在新的觀念的指導下，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共同努力改組現行的不合理的國際體制。當前這種國際體制之所以不合理，是因為他只代表了某一強勢文明的利益，並且是在對於當前的人類生存狀態來說已不合適宜的觀念的支配下。在表面上當前的這種國際體制是由不同文明的不同國家構成的，但這些組織幾乎全部被某一強勢文明的國家集團所控制和左右，最大程度地代表著並增加著他們的現實利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甚至某種時候也包括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只能成為一種國際壓迫和國際剝削的組織，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國際社會應該建立一種新的國際體制，這個體制應該以整體的、有機的、平衡的、生態的世界觀為指導，從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推進各文明間的對話與合作，促進人類合理的、適度的、均衡的發展。

全球民主的實現需要從兩個方向去努力，首先是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對自然的索取和破壞遠遠超過了不發達國家，他們對他人的掠奪聚累了鉅額財富並為他們提供了繼續聚累財富的基礎和優勢。他們應該對拯救這個傷痕累累的星球、拯救人類文明負有更多的責任。他們



應該無償支付治理環境恢復生態系統、建立合理秩序的費用，讓渡他們過於集中的權力。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這不僅在一國內適用，在國際社會也同樣適用。另一方面，全球整體利益實現不了，局部也就不可能實現真實的利益。發展中國家應該跳出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藩籬，聯合起來在國際社會爭取權利，不斷累積建立全球民主的基礎。

### 3. 新世界的建立需要具有新世界觀的政治家、民間組織和公民。

歷史上，在東方，如中國有「聖王」觀念，在印度有「轉輪王」的觀念、在西方有「哲學王」的觀念。面向建立新的世界的目標，在當今世界，人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聖王」和「哲學王」的出現，需要真正的偉大智者來領導世界。當然，我們這裡只是借用一下「聖王」和「哲學王」名稱。或者換一種最新的說法，我們需要卓越的「後現代政治家」們活躍在世界政治的舞台，我們希望未來在電視上、在網路上看到的不是面帶虛偽的職業笑容、思想空洞無物的政客，而是真誠、務實、對世界有深層理解和把握的新政治家。

這裡所說的「後現代」不是那種破壞性的、顛覆性的，而是建設性的、創造性的。這裡所說的「後現代政治家」是指具有整體的有機的新世界觀和思惟方式，對人類和世界的歷史與現狀及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有清晰的認識和深刻理解的新一代政治家和政治家集團。只有當越來越多的「後現代政治家」不斷進入權力核心，才有可能用一種對世界和人類負責任的態度、用嶄新的全球觀念、用理性和合理的方式，制定並推行未來的政策。如果美國的總統和決策集團是後現代的，那麼就可能不會出現單邊主義對美國治下和平的妄想。然而恰恰相反，美國現在朝政治集團已經並進一步把其現代性推向極端、推向無以復加的程度。布希不但不是一個「後現代政治家」，而是一個最「現代」的總統。

世界亟需在政治領域、在政治家群體中由「現代」向「後現代」的疾速轉變。這個轉變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必退。轉變越快，對世界越有利，轉變越慢，世界就進一步走向極端「現代」化，即加速世界走向自我毀滅。此外，現有的及未來的任何以促進人類福祉為目的的政黨，即使不是綠黨，也應該在建黨宗旨的制定上充分考慮到人類的生態現實和生存現實，將生態原則和全球觀念作為一個最基礎性的原則。在建立新世界觀、走向新世界的過程中，民間組織和公民個人的力量和作用甚至可以超過政治組織。世界上發生的聲勢浩大的環境保護運動、反對全球化運動、反戰運動都是各類民間組織和個人組織參與的，充分顯示了人類的良知、顯示了很多人已經充分認識到人類生存的現狀和現實政治、現有秩序的不合理及其嚴肅的抗爭。即使他們的抗爭還沒有產生能體現在政府政策中的結果，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以長期違背民意。也許民意暫時不能推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建設性的後現代政府，然而卻能終結一個他們所憎惡的現代性的政府。電影明星史瓦辛格當選加州州長的成功成為「後現代政治」的一次展現和一場實驗，但可能是一次破壞性的後現代政治的實踐，因為史瓦辛格並不見得能真正解決加州面臨的問題，但這個事件反映了公眾對於美國「現代性」政治現狀的不滿和集體反叛。這至少說明了民眾有力量終結他們所不喜歡的政治。只要加強建設性的引

導和新世界觀的教育，民意將凝聚成巨大的力量推動新的政治生態的形成和新的後現代政治生活的建立。

## (二)經濟

由於人類面臨著嚴重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困境，採取一種什麼樣的經濟運行模式和發展模式對人類未來的前途和命運至關重要。如果人類繼續沿著現有的經濟模式盲目推展下去，必將加速走向人類文明的反面。新經濟觀的建立和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對於新的全球文明的建立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是擺在人類面前最緊迫的一個任務。其中，最關鍵的環節是能源問題、經濟運行模式、消費模式。

### 1. 必須以一種加速度推動能源革命的到來。

能源問題不但是經濟發展的致命性因素，而且是國際格局不斷演化、國際關係複雜多變的根本因素。對世界能源控制權的殘酷爭奪是引發國際衝突和戰爭的主要根源。此外，威脅人類生存的環境災難也是人類使用的能源類型存在的弱點引發的。人類一直以來所依賴的碳類能源，包括核能都是不清潔、不安全的能源，他們是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現實的和潛在的主要原因。碳類能源的枯竭的時間屈指可數，核能的危險性顯而易見。因而必須大力開發無污染的能源類型，如太陽能、風能、水電、潮汐能等等。新的無污染的能源的全面開發和經濟利用將帶動新經濟的合理增長，逐步減少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指出：

從長期的趨勢看，我們需要的是可更新的、有效率的和對環境有益的能源，太陽能是滿足所有這些標準的唯一一種能源。億萬年來，太陽一直是這顆行星最主要的能源，我們使用的除核能以外的全部能量，都表現為儲備起來的太陽能。利用太陽能不需要任何大的技術革新，其貯存問題已經解決，既是經濟的，又實用，比其他能源具有競爭優勢。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關於能源的權威研究都充分表明，在技術上通向太陽能時代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關鍵是政治和經濟利益成為主要的阻礙因素。[註 23]

利用太陽能無疑符合公眾利益和人類的根本利益，但這種能源的過渡和轉變必然影響到某些國家、能源公司和個人的私利。但為了人類的福祉和全社會的共同利益，必須加速實現能源革命，這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深刻改造的第一步。能源革命的實現，將使遭受嚴重破壞的生態系統得到恢復；清潔的能源的使用將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提高必要的基礎。此外，新

的能源代替碳類能源和核能將有助於國際衝突的解決，促使國際關係和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當前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覬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爭奪石油控制權。如果新能源全面取代舊能源，石油的地位將會明顯下降，中東地區的戰略地位將發生重大變化。實際上，即使不發生能源革命，中東地區的石油何時耗盡也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到那個時候，中東的戰略地位一樣會發生變化。但兩種情況對世界及對相關國家的意義具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美國和石油輸出國都能認識到能源革命的意義，各自採取措施注重開發未來新能源，逐漸結束對舊能源的倚重。衝突或可在某種程度上避免。當然，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考量不只限於能源。如果新能源全面取代舊能源，停止對危險性和危害性極大的核能的使用。現時棘手的朝核問題和伊核問題，乃至全球的核擴散問題都可能獲得解決。核武器是反人類、反文明的人類罪惡的產物，始終是懸在人類頸項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利劍，其本身就應立刻被全面銷毀。而且由於對環境和生態具有巨大威脅，核能的使用也應全面停止。無論是軍用和民用都不能進行，這樣就可徹底避免一些國家藉口發展民用核能暗中發展核武器。當然，停止的前提的全面停止，只有核大國率先銷毀核武器或停止利用核能，核小國、無核國才能真正放棄因自保而產生的核遐想。

## 2. 建立生態經濟觀，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計畫和市場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模式，真正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人類的唯一的生存空間。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地球的生態系統是脆弱的。自從人類文明史開始的那天起，經濟發展總體上就是盲目的、無序的，特別是歐洲工業革命以來的三百多年來將這種盲目無序推到極致，將環境破壞得滿目瘡痍，打破了脆弱的生態系統的平衡，使人類的生存面臨嚴重的威脅。使人類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觀念和實踐。認真考慮未來採取什麼樣的措施謀求生存和發展。無可辯駁、毋庸置疑，未來的經濟發展必須首先考慮環境因素，以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為先決條件。這是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的原則，離開這個原則去發展經濟，只能獲得虛假的繁榮，實際上等於人類在自我否定、自我毀滅。建立起這個原則就等於建立了生態經濟觀。世界也需要建立在這種觀念上的新經濟學。現在無論多麼時髦、多麼流行的經濟學流派都沒有考慮到人類生存的現實，不符合生態的原則，在根本上是有害的，是過時的經濟學。凱恩斯學派、供應學派、福利經濟學、維也納學派、制度經濟學等等不一而足。刺激需求、擴大供應、最大利潤、自由市場、數理模型都把經濟現象和經濟學支離分割成條塊，只計一點，不及其餘，更沒有宏觀地考慮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無根的經濟學。

人類的能源是有限，即使大規模替代能源可以無限使用，然而其他人類生存必備的自然資源，水、土地卻是有限的。既然是有限的，就不能無限制地、任意地開發利用，而應該是有計畫的、適度的，既不能超出自然和環境的合理承受能力，也不能不平衡地開發利用。一些國家大量浪費資源和污染環境，另一些國家資源短缺還要被迫承受不良後果都是不合理

的。因為整個自然界是一體的，環境是一體的，人類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盲目掠取自然，無序發展經濟，是人類文明的盲點。純粹自由市場經濟，純粹自由貿易在今天還是否可行，是否可取？如果自然資源是無限的，看不見邊際的，那隻看不見的手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發揮作用。然而，情況正相反，如果完全讓那隻看不見的手以市場規律的名義翻雲覆雨，在某一時間某一資源就會很快枯竭。如果中國有五億人有買車的需求，各大汽車公司經過市場調查，認為汽車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都可以獲得市場份額，能夠賺取超額利潤，就會大規模生產汽車。然而，僅美國一個國家每年石油消費量就佔整個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國只有二億人，中國五億人都有汽車，則石油的消耗量就差不多會佔世界的另外三分之二，還不算其他國家。如此下來，經濟獲得增長了，然而能源卻很快枯竭了。以後怎麼辦？《通向奴役之路》[註 24] (*The Road to Serfdom*) 的作者、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哈耶克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1899-1992) 曾經把計畫經濟和極權主義看作是「通向奴役之路」，而呼籲必須捍衛市場經濟和自由制度。他在那部名著說：

通往地獄之路，常由善意鋪設……如果人類放棄自由主義的精神，想憑著良好的意願，自以為是地去計畫、設計社會，必將把人類引向深淵。

然而，在當前人類所處的生態危機下，如果人類任憑自由主義的泛濫，想憑著另一種良好的意願，自以為是地將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極端化，也同樣會將人類引向通往奴役之路、引向無知的地獄和欲望的深淵。這裡絕無主張一種上個世紀作為美好社會代名詞的蘇式計畫經濟、或者凱恩斯主義、福利主義、國家干預主義的意思，也絕不反對市場競爭必須被合適的遊戲規則即法律所制約的理性自由主義。

我的著眼點不在這裡，這些即使是正確的，也都已成為陳舊和過時的話語。而是：在當前的人類生存現實下，必須有一種通過國際協商與合作，從全球協調發展出發，對資源和經濟行為的總量控制和調節，單純靠市場必然會導致失去方向的無序發展，即使市場可以有規則，但規則只能制約和規範人們的市場行為，卻不能決定市場行為將人類引向何處。在當前人類生存環境下，不但各國需要在環保和生態前提下將計畫和市場有機結合起來，而且在全球範圍內，在國際社會，國際經濟的發展、國際貿易的平衡，也同樣需要在此前提下將計畫和市場有機集合起來，這也許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必不可少的前提。增長是自然界的本性，也是人類的本性。天地好生、生生不息。即使存在著增長的極限也無法而且也不能停止增長的腳步。羅馬俱樂部曾提出「零增長理論」[註 25]，認為人口、糧食、資本投資、環境污染、能源消耗等其增長都是指數式的，而資源卻不會增長，於是經濟增長的後果就是自掘墳墓，以致於世界行將崩潰而進入末日。為了避免崩潰，必須在一九七八年停止人口增長，一九八〇年停止工業投資增長，以達到零增長與全球平衡。世界上多數學者批評了這種悲觀主義立

場，認為他們忽視了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只有通過發展與技術進步才能得到解決。如果真的實行零增長理論，人類只能自取滅亡而不能達到理想的生態平衡。

零增長不符合人類的根本利益。需要找到一種合理的增長方式。應該在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對全球現有資源進行總量控制，儘早實現清潔安全能源的對現有能源的有效替代，同時，在全球範圍內控制人口的增長，爲了人類的整體利益，一種在全球，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普遍推行計畫生育的政策應該是可行的、有益的。這是人類避免倒退和停滯不前謀求發展的最基本原則。合理的、適度的、均衡的發展是拯救人類的關鍵。其內容不僅包含經濟增長，而且包括人類和環境的協調發展。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可持續發展」的觀念。

自一九八七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著名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註 26]發表之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知曉。特別是一九九二年在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註 27]以來，可持續發展定義爲「在不犧牲後代人需要的情況下，滿足當代人的需要」。

二〇〇二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註 28]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確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共同構成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它迅速超越國家民族以及政黨學派的差異，成爲人類和平發展的共同選擇。可持續發展本質在於追求一種動態平衡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維持自然、社會和人協調發展。早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就提出可持續發展五大要點，即環境保護、發展援助、能源開發、清潔水源、綠色貿易。但時至今日，這五大要點不但沒有實現，而且還遭到有關國家的嚴重破壞。人類必須把思想變成行動，把可能變成現實。

**3. 必須結束過度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泛濫，發展新型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平衡發展的簡單高尚的新生活方式。**

在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產生以前，相對來說，在東方，人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基本上是相對平衡的；在西方，不管是自我選擇的，還是受社會氛圍所影響，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重視甚至超過了物質生活，在精神和物質生活之間形成了一種不平衡。宗教對人們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內在壓力，使人們感到壓抑和窒息，不斷產生一種衝出精神桎梏的衝動，成爲近代西方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內在動因，隨後，工業革命到來，地理大發現，西方殖民擴張，過度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也不斷向全世界全面擴張，到今天已經泛濫成災。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之間的平衡又從另一個方向被再度打破。過度消費主義導致對物質的過度需求和消費，這種需求進一步成爲盲目擴大投資和生產的重要原因，於是經濟也漫無目的、無極限的增長，以至於逐漸形成惡性循環，成爲加速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儘管如此，人們還在把這種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看作是提高生活質量，對提高生活質量作了物質化的片面理解。

在摩登時代，大量的商品消費不僅不是必需的，而且是過度浪費的，實際上是有害的。不但沒有提高生活質量，反而使生活質量實際上發生惡化。我們呼吸的空氣，飲用的水，吃

的食物，生活環境，以及人際關係都發生了急劇惡化。人們忙於追求物質，忽視了也沒有時間充實自己的心靈。精神生活極度匱乏。然而這種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卻成爲時下風靡全球的生活方式。人們在拼命地追求金錢，滿足永無止境的物欲。生活質量、高尚生活這些概念被嚴重扭曲、歪曲。比如，在中國，價值很高的高級住宅被稱爲高尚住宅區，而能夠購買並使用的人群都是有錢人。實際上給人們傳達的一個資訊就是，有錢就等於高尚，高消費等於高尚，奢侈浪費等於提高生活質量。

現今人們對提高生活質量、高尚生活的基本概念就是穿名牌時裝、住大房子、開好車、能夠進入高爾夫俱樂部、買私人遊艇、私人飛機等等。這是典型的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而其他不管富裕國家還是貧窮國家也都極度渴望並紛紛倣效、努力追求，極力爭取過這種「高尚」的生活。殊不知這種高耗能的生活不但過度透支環境和資源，而且除了給人們一個物質的外殼之外，無法給人們提供精神上的滿足和真正的幸福和快樂。過度追求物質享樂地導致人們心靈空虛，精神頹廢，往往依靠毒品和性放縱來填補空白，形成惡性循環，最後導致自殺，結束寶貴的生命。過度地依賴並瘋狂追求物質享樂使人們無異於披金掛銀、身著高級時裝的衣冠禽獸，極大地降低了人的尊嚴，阻礙人類向更高的層次進化和提昇。

未來人們應該追求一種簡單高尚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環保的、低耗能的、樂於關愛他人、以慈悲爲懷，更加注重精神超越和心靈解放的新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的形成需要有識之士的倡導，需要傑出人士的作出榜樣，需要各種媒體的廣泛宣傳，需要儘早的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培育。新生活方式的建立是極其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如果這種生活方式成爲人們日用而不知的時尚，將深刻影響國際社會、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將使人類整體獲得提昇，世界無論從自然環境還是人文環境上、還是生活質量上都會變得更加美好。

### (三)文化（宗教）

文化與宗教密不可分。宗教是文明或文化的核心和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兩者不易分開。

正如進入社會轉型期、謀求民族復興的中國需要並正在著力發展一種先進文化，當前，世界也同樣處於轉型期，建立一種新的全球文明、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無疑更爲需要一種全球範圍的新文化的培育、形成並深入人心。這個新文化無疑應該是代表世界未來發展的先進文化。這個新文化既不是「全盤西化」、也不是「全盤東化」、既不是全盤「歐化」、全盤「美化」、也不是全盤「黃化」、全盤「綠化」。因爲，世界各種文明沒有一種文化是完全適應未來世界發展的純粹的先進文化。新的先進文化必然是一種南北互補、東西合璧的新型文化。

一直以來，由於西方物質文明的極度發達，人們一度產生錯覺，認爲西方文明或文化整體上都是最先進的文化，一個落後國家若想變得發達和強盛就必須全盤西化，甚至制度、文化和宗教都要無一例外地移植過來。一個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是西方發達的文化基礎，新教倫理孕育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使西方變得最發達、最現代

化。因此，一個國家如果想發達、想進入現代化，就必須引進、發展基督教、替代和置換本土文化。

實際上這種觀點是偏頗的、缺乏依據和普遍的意義。現代化並不絕對需要西化。一個非西方的國家可以不通過全盤西化達到現代化。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日本、新加坡，這兩個國家並沒有基督教化，但卻實現了現代化。還有一種觀點，如亨廷頓認為基督教與民主制度之間存在著關聯，基督教可以極大地推進民主化進程[註 29]。更有甚者，認為只有基督教化，才可能有民主。那麼，許多以基督教為文化基礎的國家應該從建立之初就是民主的國家，為什麼還需要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一波一波地緩慢到來。也許，相對於基督教而言，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概念更具有普遍意義。只要他們不被某一種文化獨斷地設立所謂的標準，他們對人類具有共同的意義。但是如果說，只有基督教化才能有民主、才能有現代化就只能說這是一種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自大主義。特別是世界發展到今天，西方文明的弊病暴露無遺，西方工業化對環境的災難性破壞、世界大戰的爆發、殺人武器的大量製造、物質主義的泛濫、生活的腐朽和頹廢，這些都是在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下產生，難道不可以反過來證明基督教文明是反人類、反社會的文明形態嗎？但我們不需要這樣的證明、不需要這樣的聯繫。

如果說現代化與西化還存在著一定的關聯，那麼後現代化則與西化毫無關係。現代化、西化這些用詞、現代化是否需要西化這些爭論，在未來建設後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已經成為僵化落後的觀念、陳舊過時的話語。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需要特別注意避免落入現代化的陷阱[註 30]、落入西化的陷阱[註 31]。在未來的全球文明建立起來的社會裡，後現代化是其主要特徵。這個新社會需要一種生態的、平衡的、平等的、合和的新文化，它將兼收並蓄，集各種文明精髓之大成。它的建立和培育將是全球文明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礎，是世界未來的先進文化。

## 1. 建立生態文化

生態文化，也可以稱作環境文化。進一步還可以將其分為外生態（環境）文化與內生態（環境）文化。外生態文化主要指為對治環境污染、生態危機而形成的主張人和自然、人與人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主張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謀求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形態。內環境文化指為對治精神空虛、心靈污染、心態失衡而形成的主張重視精神調節、保持心理平衡健康、不斷謀求自我精神提昇和超越的文化形態。基於人與人、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的世界觀，基於心物不二的對世界的思惟和認知方式，內生態文化和外生態文化並不存在一個嚴格的區分，從廣義上講，我們可以用生態文化一詞，概括這兩層涵義。歐洲工業革命以來給世界造成的生態危機催生了今天的生態文化。世界上不乏一些有識之士一直在從不同的角度大聲呼籲要建立生態（環境）文化。國際上一些綠色和平組織、民間團體很早就已開始呼籲建立生態文化。發展中國家有關人士也一直在思考提倡建立一種環境文化。

最近，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會長潘岳先生撰寫了一篇〈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註 32]的長篇文章，系統闡釋了環境文化的深刻內涵。他指出：

凡致力於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係，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型態，即是環境文化。環境文化是人類的新文化運動，是人類思想觀念領域的深刻變革，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層次上對自然法則的尊重。

因其核心是一種生態文明，環境文化即是今天的先進文化。

他總結了環境文化的幾個特徵，其概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包括：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生態系統是脆弱的，如果任意摧殘和破壞，人類將無家可歸；人類是自然生命系統的一部分，不能獨立於複雜的生態網路之外。人類與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不可分離；人與自然的關係制約著人與人的關係。調整好人與自然的關係，便是協調人類的社會關係，便是追求人類社會的和平與進步；人類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進文化都是生存於自然中的文化。生存於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與自然的辯證統一，就是人類生存的本質；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科學技術不應讓人們誤認為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是無限的。把「人定勝天」推向極致，將使人類陷入生存困境；環境的權利與義務必須統一。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必須與對環境的修復相平衡。

發達國家和高消費人口是全球資源消耗的主體，他們有義務承擔起更大的環境責任；自由是對自然法則的遵從，受自然法則的約束。自由不是貪婪與放縱。人類有享受物質生活、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權利，但這權利只能限制在環境承載能力許可的範圍之內。潘岳先生的論述雖然立足於中國國內，強調環境文化對於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作用。但其意義和影響並不只限於中國。如果向外推演，對整個國際社會、對建立新的全球文明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其觀點也與本文建立新的整體世界觀和建立全球文明的主張是一致的。

中華傳統文化中具有豐富的生態文化思想：強調人與自然的一體，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緣起」和「依正不二」的思想，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基本思想。他們均主張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也非外於人的存在物，人與自然間並無絕對的分歧和對立，而是互相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人要服從自然規律。人的自我實現與自然規律和宇宙法則是一致的，人生理想就是人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從而達到一種完滿和理想的境界，這是中國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人也只有順應天意，遵循自然規律，才能國泰民安，天下太平。中國很早就有自己的「生態文化」。中國古人很早就認識到，要



想利用生物資源，必須注意保護，合理開發，反對過度利用。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既有豐富的保護環境的思想，也有嚴格執行環境保護的法令，還有在把發展經濟同環境保護結合起來，使二者互相促進的做法。早在先秦時代，古人就規定春天不准砍伐樹木，夏天不准捕魚，不准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要根據氣候節令，選擇打獵、捕鳥、捕魚、砍伐樹木、燒荒的時間；禁止春天採集剛剛發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獸，禁止毒殺魚等等舉不勝舉[註 33]。

在內生態文化建設上，人們最常聽到的就是「心靈環保」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最早是由中國佛教界提出的。台灣佛光山的星雲大師、法鼓山的聖嚴法師[註 34]等，大陸的聖輝、學誠、濟群、聖凱[註 35]等諸法師經常在各種場合不遺餘力地倡導心靈環保。為了有效地落實心靈環保，創造祥和社會，佛光山星雲大師努力呼籲「三好運動」，即「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註 36]。法鼓山的聖嚴法師多次以心靈環保為題進行專題講演，系統地闡釋如何進行心靈環保。他們還發布了心靈環保宣言[註 37]等。

實現心靈環保、建立內生態文化甚至比建立外生態文化更為重要，但人們往往能夠注意到外環境保護，卻容易忽略心靈的環保、保護內在心靈的環境不受污染。用佛教的話來講，就是只看到了需要國土淨，沒有看到更需要心淨，「心淨則國土淨」。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物質文明的發達並沒有真正給人類帶來精神上的自由、安寧和幸福，人類成為欲望的奴隸，在欲望的痛苦中掙扎。人類心靈遭受污染的污染源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得多，行為方式的多樣性，使人們對一些事物真假難辨、好壞難分，資訊的發達使得人們更容易受到消費文化、色情文化、邪說暴行的影響。人模擬以往任何時候都缺乏處理好物質與精神、心與物之間的關係的能力。

現時，人類的心靈從總體上處於一種雜亂、空虛、苦悶、焦灼、彷徨、無助、無所適從的狀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得到精神滋養和心靈指導。人類進行精神修煉的形式主要的是宗教提供的。提倡心靈環保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傳統正信宗教的復歸。但並不是簡單的回歸，是必須經歷一番深刻地檢討和反思後的創造性地復歸。當今世界的各大宗教和精神傳統都面臨著這個任務。目前全世界約六十億人口約八〇%的人信仰各種宗教。但為什麼人們的心靈反而比過去更為空虛，世界比過去更為紛亂和不安寧？無非有三種情況：一是對經典的理解和解釋有問題，二是傳教（或傳播文化）的方式有問題，三是信仰者沒有真正理解宗教戒規的真正涵義並嚴格遵守。實際上出現的與宗教有關的形形色色的暴力衝突事件都遠離了各個宗教的本懷。解決這些問題將對心靈環保的實現、內生態文化的建立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如果各大宗教傳統能夠推陳出新，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切實解決現實問題。就會作為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繼續引領人類未來的進步。

## 2. 建立中道文化

中道一詞在這裡的主要涵義是指平衡、適度，不是簡單的「折中主義」。實際上在生態文化中已經涵蓋了這層意思。謀求可持續發展就包含有平衡發展、適度發展的涵義。但單獨

提出、突出強調中道文化仍然是有必要的，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從物質到精神、從生產到消費、從個人到社會都需要恪守中道，因為過猶不及，一種均衡的狀態是人類生存的最佳狀態，是人類追求的最深層目標，反映了人類的本質。如，在人類追求的幾個主要的永恒價值中，自由是最重要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自由是人類前進和進步的光榮旗幟，人類常常為自由而戰。但到底什麼是自由？卻並非清晰可見。

人類往往因誤解自由而偏離了自由的軌道，或者走向自由的反面。自由不是沒有約束，而就是身心達到一種理想的均衡狀態，處於中道。再如，當今世界，消費主義盛行，人們沒有節制欲望的觀念，導致縱欲過度、浪費過度，成為環境危機、社會問題產生的重要因素。如果抱有一種中道觀念，懂得平衡和適度的道理，用中道文化取代消費文化，就能還社會以健康和清靜。又如，當今世界宗教極端主義盛行，導致宗教不容忍，引發大量的矛盾和衝突。如果能恪守中道，就會遠離極端。建立新的世界觀和全球文明必須發揚中道文化，因為未來世界的特徵就是生態平衡、均衡發展。沒有這種中道文化的普遍建立和深入人心，就不會有新的全球文明的出現。在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三大主幹儒、釋、道思想中，「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核心概念，雖然三家對「中」有著各自的理解和闡述。但共同構成了代表中國傳統思想精髓的思想和理論體系。甚至中國這個名稱，除了「中央之國」的涵義外，也不無尊崇「中」這個中國傳統思想核心觀念的意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道的觀念和實踐是比較發達的。

在中國古代儒家經典五經之一的《尚書·大禹謨》中被稱為儒家道統心傳的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就出現了中的概念。在四書中的《論語·堯曰》中也有「允執其中」四字，而《中庸》通篇都是講中道思想。宋代理學家程頤解釋中庸為：「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中還有一個「中和」的概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即認為中和是性，中和是道，中和是宇宙的本來狀態。達致中和狀態，天地就會正常運轉。

中道思想也貫穿於《周易》六十四卦始終，《周易》的卦形由帶代表陰陽的兩個基本符號組合推衍而成。表示「一陰一陽之謂道」（《繫辭》上五章）。陰陽平衡、協調就能合乎於道。這種陰陽平衡觀可以用來對治西方文明陽性過度發展所帶來的弊端。易經中的節卦講「剛柔分而剛得中」。「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苦節不可」。節，大意指節制、節約，可以亨通；但是過分地節制，節約就是苦節，過分的節制也不合乎事物發展的規律。不能做為正道堅持。凡事節制適當，持中正即可亨通。在整個儒家思想體系中有著深刻的節欲觀和豐富的節欲、導欲、養欲理論[註 38]，這種適當合理節制的觀念可以用來對治現在過度的消費主義盛行的弊病。易經中的中道思想十分豐富，需要進行認真地發掘研究。

在佛教中，「中道」是核心觀念。佛祖釋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為五比丘說法時即強調：在諸欲中耽於欲樂者，乃下劣凡夫，為非聖無意義之事。雖然，以自身所求之苦為苦，亦為

非聖無意義之事。離此二邊之中道，方依於如來而能證悟。在佛教的歷史中，各個教派對「中道」的理解不盡相同，如緣起中道、八不中道等。但儘管如此，卻普遍把「中道」當作佛教的最高真理，與真如、法性、實相、佛性經常替代使用或互相解釋。大乘佛教的中觀派的「中道」觀最具典型意義，理論更加完備和精深。

作為一種人生觀，中道主要指遠離對任何二元對立兩邊的執著，是一種不走極端、不偏不倚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中道的人生，不走極端。既不聽天由命，也不主張人定勝天；既不縱欲享樂，也不禁欲苦行；既重視生，也關注死；既講自利，也講利他。正確認識和把握這種中道觀是獲得幸福生活和永恆快樂的條件和保障。佛教中道思想的涵義非常深廣，在此無法詳細展開闡述。但對其深入發掘無疑將對世界未來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 3. 建立平等文化

平等一詞，初看似乎並沒有什麼新鮮的感覺。然而，人們對平等這一觀念的理解往往是偏頗和不全面的，有時甚至是狹隘的。目前，我們通常所說的平等，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但實際上即使這種普遍意義上人與人的平等也沒有實現。在過往西方的主流觀念和實踐裡，平等是西方人內部的平等，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文明的，而其他人是落後野蠻的。另外，由於西方人的認知方式，使他們把自然作為人的對立面，作為人征服的對象。自然界、生物、環境都不是與人平等的，都是可以有人來肆意妄為，任意破壞的、隨意掠奪的。這最終導致了環境污染、生態遭受破壞的現實惡果。

我們這裡所說的平等，是真正的、最廣泛意義上的平等。平等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也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文明與文明之間、人與動物、植物等其他一切萬物生靈之間普遍無差別的平等，還包括心與物之間的平等。他們之間是相互作用、互為影響的關係，它們之間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這樣一種平等的觀念才能使人們真正認識到世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就像一個人體，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個部分受到破壞就會影響到另一個部分，一個方面持續嚴重的破壞就會導致整個肌體的病變乃至死亡。只有這樣一種平等觀，才能使人類真正去實踐環保的理念，拯救陷於生態危機中的地球，解放人類貧瘠空虛的心靈。

在當前人類生存狀態下，在走向未來新世界的過程中，這種偉大的平等觀無疑應是未來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佛教思想中，這種廣大的平等觀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卻遠未被充分廣泛深入地認識和推行。佛教超越了人與人平等的觀念，進一步將平等的觀念擴展到芸芸眾生。佛教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一律平等，皆有生存和被尊重的權利。所謂「眾生」，《金剛經》說：

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

此皆名為眾生。所謂「眾生平等」，上自諸佛菩薩，下至有情含識，都有生命的尊嚴，都有生存的權利。宇宙間的生命同體共生，才有真正的平等。在佛教的經典中，有關「平等」的教義、思想，比比皆是。例如：

《華嚴經》說：

一切眾生平等。

《大智度論》說：

凡夫與佛平等，無二無別。

《大般若經》說：

上從諸佛，下至傍生，平等無所分別。

《金剛經》說：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所以佛教提倡要關懷眾生，救度眾生，為天下眾生服務。佛教說「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是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尊重眾生，慈悲眾生的最佳詮釋。無緣是無條件的；同體，是將人我眾生等同一體。佛教認為，眾生在無始以來都是互為父母兄弟姊妹。如果一個人把他人人都看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就會去除差別心，真正去關心和愛護眾人。所以只有建立了真正的平等觀念，人類才能消除差別、執著、不容忍和互相侵害等。只有建立這種無差別的平等，才有了世界的和諧和平的基礎。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曾在一篇〈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的文章中[註 39]集中闡述了佛教的平等思想，可以使人們更加充分深入地瞭解佛教平等觀的深意所在。

#### 4. 建立和合文化

「和合」的概念在這裡主要包括兩層涵義：和即和睦、和諧、和平，合即結合、融和，合作。指的是兩種以上不同事物之間通過協調、結合、融和，而達致和諧和平的理想而合理的狀態。世界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都應該建立一種和諧的關係；為達到和諧圓滿的狀態，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關愛，國與國、文明與文明之間應該互相尊重、謀求和解，優勢互補、緊密合作，只有如此，人類才能獲得真正的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繁榮。建立並發揚和合文化，對未來新世界和人類共同利益的真正實現的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我們所說的「和合」不是毫無差別的混同，千篇一律的一致。「和合」的前提是差異性的存在。和合就是保持不同，又能各安其位，形成和諧的統一體。和合不是我吃掉你，或你吃掉我，不是同化。比如中國賢哲常講和而不同，就是主張雖有不同但要和睦相處；而西方人往往採取一種同而不和的態度，為了趨同，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價值觀和文化、宗教強加給別人，因此引發了大量的衝突不合。

顯然，和而不同的和合觀更具有建設性。這裡並不是說，因為我的文化背景是東方的，我就偏向認為東方優越。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各種文明都具有長處、也具有短處。你之所長正是我之所短。所以需要各種文明各正其正，各安其位，各取所長，優勢互補，合作互利、協調一致。比如，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是西方所長，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內是合理實用的，在這個範圍內合理充分地運用對人類是有益的。但在微觀世界和更廣闊的宏觀世界，這種方法就因為人作為觀測者的局限性而「測不準」，實際上就是西方對象性的認知方式、支離分析的方法在這個範圍內不再有效。而需要一種整體的直接的綜合把握。在這方面東方的思惟和實踐方式更加具有優勢。

東西方的和合將會使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更加深入和充分。再如西方注重發展人的外在的延伸工具，製造大量的機器，而機器的泛濫不但對環境造成了威脅，而且使人本身發生異化，被其所束縛，走向自身的反面。而實際上人的自身內在潛能九〇%沒有開發出來。而東方在開發人自身潛能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把人的外在发展 and 內在發展結合好，將使人類提高更大的自由度。再如，西醫的優勢在於快速解決局部急症，快速治標；中醫的優勢在於對肌體

進行全面調理，使人體恢復自身平衡，緩慢治本。如果將中西醫結合起來，標本兼治，對人的身體健康將更有益處。

總之，和合文化的涵蓋面是很廣的，對人類的未來也是意義深遠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和合的民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的觀念和實踐是非常豐富和發達的。「和合」是中國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認同的人文精神，它縱貫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全過程，積澱於各個時代的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因此，它體現著中國思想文化的首要價值和精髓，也是中國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生命力的體現形式。《國語·鄭語》曰：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

這裡反映了諸方面、諸要素的協調配合，相輔相成，事物內部諸要素的對立統一推動著事物的發展的辯證法則，也具有鼓勵從各個不同角度、側面提出各種不同、衝突意見，而後加以融和的社會意義。《尚書·堯典》：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這是中國古代「協和萬邦」觀念第一次完整地表述出來。「親九族」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平章百姓」就是繼而把自己的國治理好；進而使各國團結起來，這就是「協和萬邦」。〈堯典〉此句的背景是在殷周時期邦國林立的情況下，以道德教化為本，以治理好本邦為前提，然後去感化他國，體現了一種處理邦國關係的原則和理想。這個原則和理想就是「和合」。《論語·學而》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就是講禮的作用是按「和為貴」的要求調節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使之圓滿和諧。《周易·乾·彖辭》中孔子在解釋「乾卦」時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意為天道的大化流行，萬物依其本性處於正道，保持著完滿的和諧，使自然和社會順利發展。天道超然於萬物之上，保證自然的大和諧和萬國的大安寧。這些都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精神在民族、國家、文化層面上的重要體現。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這些表述是具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我們不能望文生義，而應該在把握其

基本精神、不失原意的前提下，做出合理的新闡釋。當前很多有識之士都在大力提倡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和合文化。

一九九七年，中國在北京成立了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組委會。蔡方鹿在〈中華和合文化研究及其時代意義〉[註 40]中指出：世界上有二百多個國家，有好幾千個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能只有一種模式、一種要求。應該是多元而又互補的，即衝突又相交流的。在這方面，中華和合文化可提供解決衝突、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共同發展的理論思想，可提供反對霸權主義的價值評判標準。使人類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時代的挑戰中，相互吸取優長，融會貫通，綜合創新，而共同創造二十一世紀人類未來的文化。中國著名學者張立文先生還通過系統地整理分析推演，專門創建了「和合學」，出版了《中國和合文化導論》、《和合學概論》[註 41]等學術專著。美籍華裔學者成中英先生也在專著中對「和合文化」的特徵作了精闢論述。這些理論探索對向世界推演和合文化、在建立全球文明、構造新世界的進程中塑造新文化具有很大的價值。

## 5. 建立宗教間的和解與合作

文化或文明的核心是宗教（包括具有宗教功用的教化系統），基本上可以說是在世界範圍內取得的共識。然而在當今世界，打著宗教旗號或者以宗教面貌出現的極端行爲、暴力恐怖活動、不同宗教背景國家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宗教似乎成爲世界動盪不安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解決現實的問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宗教之間的和合顯得尤爲重要。美國猶太州參議員哈奇在講演[註 42]中說過一句非常精闢的話：「恐怖分子劫持了飛機，同時也劫持了宗教。」的確，暴力、殺戮、掠奪、仇恨都不符合宗教的本懷。伊斯蘭教本意就是主張和平的宗教，基督教主張愛人如己，佛教講慈悲爲懷，儒家傳統講仁者愛人等等。真正的宗教不會主張仇殺、暴力。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之所以採取暴力的手段達到某種目的，客觀原因也許可以歸爲對不公正和壓迫產生的絕望，但主觀上卻與他所受到的宗教教導密不可分。絕大多數的教徒是虔誠的、單純的，但卻容易被蠱惑或被利用。如果一些人對教義作出斷章取義、別有用心的解釋，告訴教徒：你去殺人吧！殺人可以進天堂。對於一個普通的虔誠教徒來說很可能會接受。在這裡，不但宗教被歪曲利用，人們的虔誠也被利用了。但反過來，如果一位真正的阿訇告訴他，我們的宗教是主張和平的宗教，聖戰的本意是要我們克制並戰勝自己的私欲。那麼很可能他不會去做一個人肉炸彈。

事實上，很多穆斯林都認爲，賓拉登的思想、言論和行爲並不能代表真正的伊斯蘭教。卡塔爾國埃米爾謝赫哈馬德·本·哈利法·薩尼殿下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多哈舉行的卡塔爾國顧問委員會第十三屆常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強調：我們都注意到，九月十一日對美國發動的野蠻恐怖主義行動奪取了數以千計無辜平民的生命。我們最強烈地譴責這種行爲，並強調，必須將肇事者追拿歸案並繩之以法。全世界已認識到這種犯罪行爲對人類前途、人類進步、人類幸福和世界穩定構成的危險，一致認爲必須反擊這種現象，消除世界上的恐怖主義罪惡。穆斯林國家處於這場戰鬥的前沿。它們不僅於二〇〇一年十月在多哈舉行的伊斯蘭

外交部長會議緊急會議上一致譴責這種罪惡的恐怖主義行爲，而且在數年前就通過了制止恐怖主義公約草案，並敦促伊斯蘭國家加入這項公約。但是，針對有人妄圖以恐怖主義的指控污蔑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阿拉伯國家和穆斯林國家不得不進行自衛。但恐怖主義不是一種特定宗教、一個特定地區或特定種族特有的現象，就像恐怖主義不符合宗教法的所有教義，特別是真正的伊斯蘭教義，因爲伊斯蘭提倡仁慈、容忍和友愛，而不是提倡暴力、敵意和仇恨。我們希望阿拉伯國家和穆斯林國家採取有力步驟駁斥這種不公正指控。我們必須極其猛烈地反擊這種指控，同時以針鋒相對的方式進行客觀對話，並展示伊斯蘭的真正形象，闡明伊斯蘭在人類文明中的作用[註 43]。只要人們對宗教、對恐怖主義都有清醒的認識，並作出正確的區別，文明間的和解是可以實現的。

**宗教間的和解第一步是：首先要通過各宗教的領袖們和神職人員對本宗教的經典和教義做出積極的符合教義精神的全面闡釋，並使之成爲信仰的主流。這樣信徒接受的就是正面的積極的東西，就會在現實生活中進行積極健康的實踐。**

**第二步就是，各宗教的教徒都要真正做到遵守本教的最基本的戒律。事實上在各大宗教傳統中，最基本的戒律都是相同或相通的。比如說，不殺、不偷盜。無論是佛教、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等都有規定。如果每一個信徒都嚴格的遵守這條戒律，則世界上根本不會出現流血衝突和互相仇殺，戰爭就會遠離人類。**

實際上，各國宗教界已經開始在這個問題上進行合作。這就是上個世紀九〇年代以來開展的建立全球倫理運動。一九九三年，來自世界各地的六千五百名宗教界領袖、神學家及其他人士會聚芝加哥，參加世界宗教議會年會，會上發布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註 44]。提出：

沒有新的全球倫理，便沒有新的全球秩序。

「全球倫理」不是指超越一切現存各種宗教的一種新的單一宗教，也不是指用來支配所有的宗教，而是「對一些有約束性的價值觀、一些不可取消的標準和人格態度的一種基本共識」。這種定位符合「和合」的精神。它沒有強加於人的意味，沒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只是著眼於尋找那些爲各文化圈內的人群所廣泛認同的倫理規範和道德標準，並以之爲國際關係及世界秩序的重建所應遵循的準則。這樣一種以「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識」爲前提的全球倫理體現出通過多元文化對話尋求消弭爭端、推動發展的良好願望。全球倫理如果真要成爲「有約束性的價值觀」，並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中發揮作用，當然也不能僅憑號召和研討。全球倫理宣傳發布已經十年過去，然而「文明間的衝突」卻愈演愈烈。這說明全球倫理還沒



有真正建立起來，各大宗教傳統還需進一步努力，還必須行動起來，真正建立起人類的底線倫理，使人類自覺地豎起防止衝突的內心屏障。

**第三步就是各宗教簡要彼此尊重、互相寬容，加強對話、加深理解，宗教領袖要建立經常性的國際磋商機制。**各宗教間的彼此尊重是保持和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首先，各大宗教傳統必須正確看待自身，唯我獨尊、妄自尊大是導致衝突的開始。終極真理只能是一個，不可能有兩個，唯一性應該作為信仰層面的東西，而不能運用到實際交往中。各大宗教應該把自己的一整套體系看作是適合於不同人群的通往真理的不同途徑。正如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所說：

佛教徒說佛教最偉大，基督教徒說基督教最偉大，都是對的；但是，如果能夠尊重對方，佛教徒說基督教也很偉大，基督教徒說佛教也很偉大，這樣會更圓滿。[註 45]

其次，各大宗教必須採取和平的順其自然的傳教方式，尊重所在國的文化傳統，積極尋找契合點，才會符合宗教的宗旨，才會獲得成功。任何以武力、強迫、與政治攪在一起的方式進行傳教都是對其他宗教的不尊重和挑釁，必然引發衝突，也不會取得成功。

佛教的傳播基本上是走和平傳播的路線，中國甚至有很多高僧主動跋山涉水赴印度求取佛法。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能夠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緊密結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筆者曾經翻譯過荷蘭著名漢學家許理和（Zücher）先生的大作《佛教征服中國》[註 46]，這本書詳細描述了佛教融入中國的過程。佛教征服了中國，中國也發揚了佛教，並使自身的文化變得更為豐富多彩、更有深度。

伊斯蘭教早期向世界的傳播，與阿拉伯帝國的向外武力征服有著密切的聯繫。但自十世紀後，伊斯蘭教在非洲、亞洲和東南亞的廣泛傳播以及伊斯蘭化的過程，通常是通過商人的貿易活動、文化交流和傳教師的傳教活動而實現的。因為注意結合當地的特點，因而總體上也是成功的。

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等）向歐洲以外的傳播則是隨著西方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伴隨著血與火傳播開來的。我們不排除有些傳教士是憑著一腔宗教熱忱去傳教的，但教會當局總體上採取的是一種殖民主義的傳教路線，也願意利用西方強國的武力擴張進行傳教。而列強也願意在進行軍事侵略的同時利用基督教進行文化侵略，想從精神上摧毀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從而牢牢控制住這個國家。如，在西方列強強迫與中國清朝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在通商的條款之外，往往都有傳教的條款。傳教士在簽訂這些不平等條約

的背後也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們在傳教的時候秉承著兩個前提，一是我的文化和宗教是最好的、最先進的，二是我的文化和宗教不需要適應你的土壤，你必須無條件接受我的宗教。如果你不接受，我在有能力、有可能的時候就要強迫你接受，我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也要通過各種秘密的方式輸出，對你進行干擾和破壞。

在文化根基脆弱的地方，西方殖民者的辦法就是趕走土著人，搶佔他們的家園，建立他們自己的統治和宗教。但在文化底蘊深厚的文明古國，西方殖民者和傳教士的這種辦法不會取得成功。如在中國清朝的康熙年間，因為羅馬教廷當局不尊重中國的風俗習慣，招致百年禁教。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羅馬教廷支持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率先承認日本建立的滿洲國傀儡政權，縱容法西斯分裂中國，最終遭到中國人民的唾棄。

直到今天，西方仍然想通過傳教作為先導，謀求在中國建立西方式的民主，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來同化中國。這仍是過去殖民主義心態的再現。傳教的目的已不單純，注定無法取得成功。中國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先生在對美國西部基督教領袖的講演[註 47]中曾經指出：

朋友們，我知道你們把對聖經的信靠和傳福音視作自己的生命，正如使徒保羅所說：  
「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新約》哥林多前書九：十六）

其實，中國人對這「福」和「禍」兩個字，也很熟悉和敏感。大家可能聽說中國古代的哲學家老子的名言：「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就是說，福禍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的，只有處理得當，才能得福避禍。你們說不傳福音會有禍，但如果不根據時地、環境等具體情況而盲目傳福音，會不會也有禍？會不會使「福音」變成「禍音」，把「傳福音」變成「種禍因」？

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史證明，「你若亂傳福音，你就有禍了」。真正的宗教應該從政治中剝離開來，不但要防止成為政治的工具，更不能想利用政治活動去傳播信仰，只能通過單純的文化交流與和平傳播，信仰才能真正的深入人心。至少在今日世界應該把持這個原則。

第三，為加強溝通和協調，在化解衝突、推動國際合作中發揮正面的、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應該建立經常性的宗教領袖國際磋商協調機制。在這個世界上，有六十億人口中八〇%的人信仰各種宗教的事實，有很多各類重大國際衝突事件與宗教因素有關或具有宗教背景的事實。因此，這個世界現有重大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各大宗教傳統和宗教領袖的參與，宗教與世界和平的關係比任何時代都更為密切、更為重要。

西方天主教思想家孔漢思（Hans Kyng）曾深刻指出：沒有各宗教之間的相互瞭解，國與國之間則很難相互瞭解；沒有各宗教之間的對話與溝通，諸教之間則很難達到和平與友好；而諸教之間若不能和平相處，諸國之間亦不可能和平相處或安全共存。

宗教的本懷都是勸人為善，防非止惡。宗教領袖和宗教教職人員往往是信徒的精神導師和行為榜樣，在教徒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宗教領袖如果寬厚仁慈、心胸開闊、道德高尚、客觀公正、謙讓尊重，則會對信徒有非常積極的影響。各國宗教界特別是宗教領袖對和平和國際合作的態度對普通信徒有著不可替代的影響。如，對於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美國的天主教會、新教等多數主流教會都作出決議和聲明反對戰爭。大不列顛天主教神學協會的年會作出決議指出，任何對伊拉克先發制人的武力行動，都是不道德的，是國家恐怖主義行為。該協會發言人指出，先發制人的動武行為，按傳統的教導，構不上正義戰爭的最基本定義。美國和英國並不擁有以暴力方式更換外國統治者的國際權力，況且目前與伊拉克和平解決爭端的手段並未用盡。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就美國對伊拉克戰爭的問題發表書面聲明，表明美國天主教反對戰爭的立場。主教們還建議委員會應該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提出更多的問題，也應該為美國軍隊中的天主教徒設立道德的守則，不會使他們在政府與教會之間的不同立場影響之下，無所適從。美國教會採取高調的反戰立場，雖然沒有遏止戰爭，但卻體現了關懷社會公平和正義，反對非正義的戰爭的道德力量。全世界各大宗教傳統的領袖們應該更為廣泛地聯合起來，以其特有的影響來防止衝突和戰爭、推動和解與合作，這將對人類和平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意義。實際上，世界各國的宗教領袖一直在尋求和解與合作，展開了各種形式的對話，召開了各種和平會議。具有代表性的如：

一九八九年，各宗教界有識之士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下在巴黎召開「世界宗教、人權與世界和平」會議，提出「通過宗教和平達到世界和平」的口號。

一九九三年八至九月，各宗教領袖和代表雲集芝加哥，召開世界宗教議會，並且發表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二〇〇〇年，在聯合國的支持下，召開了世界宗教和精神領袖千年和平會議[註 48]，旨在團結宗教與精神界領袖作為聯合國與不同宗教信仰的聯合，以獲得和平，達成全球性的共識與國際合作。發表了〈世界和平宣言〉。並建立宗教和精神領袖國際顧問會議，作為聯合國阻止衝突並試圖加以解決的資源。但到目前為止，這些宗教間的對話活動還是個別，臨時的，並沒有形成一種固定的機制，更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解決辦法。

二〇〇〇年聯合國召開的世界宗教和精神領袖千年和平會議是一次代表性非常廣泛，對宗教間對話與合作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一次會議。然而就在他結束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在人們對宗教和解剛剛升起希望之時，九一一恐怖襲擊殘酷而慘烈的發生了。這充分說明通過世界宗教領袖的密切合作來化解國際衝突、消除暴力、維護和平任重道遠，還需要艱苦的跋涉，還需要找到更為有效的辦法。為此，應該建立起一種長效的固定的由世界宗教領袖組成的對話與合作機制，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年會，進行常規問題討論，進行專題研究，商討解決辦法，

制定實施計畫和進度表，對世界和平進程和國際問題的解決發生積極的真實的影響，並逐漸成爲代表國際良知、世界正義、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推動世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

## 6.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未來建立全球文明進程中的使命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這個蘊含深刻哲理和寓意的經典表述所傳達的資訊，對於今日步履維艱、不知何去何從的世界發現新方向顯得尤爲重要，對於亟須優秀文化滋養的新文化的化生最爲貼切。現時世界仍處於建設現代化的現代社會，繼續沿著這個方向前行，人類文明將走向盡頭。未來新世界無疑將走向後現代化的後現代社會，建立並沿著新文化的方向，人類將如鳳凰浴火般獲得再生。

前述所說的生態文化、中道文化、平等文化與和合文化，這些文化形態都具有後現代文化的特徵，都屬於新文化的範疇，都將是引領未來新世界的先進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概而言之，離不開儒釋道文化的精髓。在儒釋道思想中包含著極其豐富的生態文化、中道文化、平等文化、和合文化的內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然與當今的後現代文化不完全等同，但卻天生地具有後現代文化的特徵和品格，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後現代文化具有更爲深厚的底蘊和更深邃的思想。民族復興的先導是文化復興；世界發展、人類進步的前提是創造新文化。深入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充分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不但對於正在謀求建設先進文化，走向民族復興的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意義，而且對於在國際社會培育新文化、走向地球文明新紀元的世界都具有更爲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更爲深遠的歷史意義。

人類需要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世界需要開創一個全新的未來。一個安寧祥和的新世界是可能的。因爲無論人與人、國與國、文明與文明間有多大的差異和不同，我們在呼喚自己最親愛的母親時發出的都是同一個聲音：MaMa.（媽媽）。難道地球不正是人類共同的母親嗎？

正如在寒冷的冬日裡我們會聽到春天的聲音，在安守靜篤的深夜裡我們也聽得到新世界輕輕的呼吸聲和緩緩的腳步聲。

### 【註釋】

[註 1]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weo/pubs/weo2000/weo2000.asp>

[註 2] 美國物理學家弗·卡普拉 (Fritjof Capra)，《轉折點—科學、社會、興起中的新文化》（*The Turing Point-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ulture*）（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一七三頁。相關內容可參閱 <http://www.fritjofcapra.net/>

[註 3] <http://www.yebio.com.cn/yebio/ill/ill4.htm>

[註 4]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19930601FAESSAY5188-faarticles/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html> · <http://www.alamut.com/subj/economics/misc/clash.html>

[註 5] 《辭海》，第三六三頁；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第二四一頁，conflict, fight, struggle, quarrel. Opposition difference p.204 clash, disagreement, conflict.

[註 6] 《辭源》，第一五二六頁。

[註 7] <http://www.alamut.com/subj/economics/misc/clash.html>

[註 8] 同 [註 7]。

[註 9] 同 [註 7]。

[註 10] 美國參議員奧林·哈奇在第十屆國際法律與宗教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楊百翰大學法學院二〇〇三年十月四日至七日。Senator Orrin G. Hatch, U.S. Senator and Chairman, U.S.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 Speech before the Tenth Annual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igion Symposium. ,Law School,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Oct.4-7, 2003. Provo, Utah.

[註 11] 同 [註 7]。

[註 12] 中文版見：<http://www.epman.cn/book/growth/>  
英文摘要版見：<http://www.clubofrome.org/docs/limits.rtf>

[註 13] 關於卡普拉見：<http://www.fritjofcapra.net/>

[註 14] 關於大衛·格里芬及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參見：<http://www.ctr4process.org/>（美國過程研究中心網站）。大衛·格里芬，《後現代科學》中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大衛·雷·格里芬著，王成兵譯，《後現代精神》（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王治河，〈後現代主義的建設性向度〉，《中國社會科學》（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大衛·格里芬訪談：<http://www.cc.org.cn/zhoukan/renwuzhuanfang/0301/0301241010.htm>

[註 15]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8/29/class001800001/hwz174005.htm>

[註 16] 本文提到的後現代主要指建設性後現代主義。關於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請參見：  
[http://www.religion-online.org/cgi-bin/researchd.dll/showarticle?item\\_id=2220](http://www.religion-online.org/cgi-bin/researchd.dll/showarticle?item_id=2220)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4/1/class005400018/hwz37925.htm>

[註 17] 在巴西 Porto Alegre 召開的五萬人參加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主題。參見：  
<http://www.grassrootsonline.org/wsf.html>

[註 18] 同 [註 7]。

[註 19]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註 20] 美國前總統弗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回答為什麼支持獨裁者時如是說。

[註 21] 《環球時報》（二〇〇三年十月十日第十五版）。<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0354/944540.html>

- [註 22] 大衛·格里芬著有《超越富豪統治，帝國主義和恐怖主義：全球民主的必要性》一書，有關內容可見"Global Imperialism or Global Democracy"一文：<http://users.drew.edu/mnausner/ttc3griffinpaper.pdf>
- [註 23] 美國物理學家弗·卡普拉 (Fritjof Capra)，《轉折點——科學、社會、興起中的新文化》( *The Turing Point--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ulture*，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第三〇一頁。
- [註 24] 《通向奴役之路》中譯本：<http://www.bookhome.net/zhexue/other/twnyzi/index.html>
- [註 25] 參見羅馬俱樂部報告，《增長的極限》( *The Limits to Growth* ) <http://www.clubofrome.org/docs/limits.rtf>
- [註 26] 該報告暨可持續發展觀念見：[http://www.provincia.fe.it/agenda21/documenti/bruntland\\_report.htm](http://www.provincia.fe.it/agenda21/documenti/bruntland_report.htm)  
<http://www.wsu.edu/~susdev/WCED87.html>
- [註 27] <http://www.un.org/geninfo/bp/enviro.html>
- [註 28] [http://www.johannesburgsummit.org/html/documents/summit\\_docs.html](http://www.johannesburgsummit.org/html/documents/summit_docs.html)
- [註 29] 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中譯本：<http://www.bookhome.net/zhexue/other/dsb/>
- [註 30] 中國著名學者何清漣女士著有《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一書。雖然其著眼點是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觀念上和制度上的一些弊端和問題，但本身也包含了「現代化」本身存在的問題。對概述內容有所瞭解有助於幫助我們認識發展中國家進行現代化應該注意的問題。原書見：<http://www.booksea.com/zz/jj/h/heqinglian/xiandaihua/>
- [註 31] 中國著名社會學家王力雄先生撰文〈中國實行西方制度的末路〉有助於我們理解應根據不同國情尋找發展道路。[www.chinesenewsweek.com/172/Specials/17698.html](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172/Specials/17698.html)
- [註 32] 全文見：<http://news.sina.com.cn/c/2003-10-25/14341998234.shtml>
- [註 33] 有關先秦保護環境的思想和做法參見：<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xqbhhdjdxjdzh.htm>
- [註 34] [www.ddm.org.tw/mental\\_ep/index.asp](http://www.ddm.org.tw/mental_ep/index.asp)
- [註 35] [www.dharmaofbuddha.com](http://www.dharmaofbuddha.com) , [www.jiqun.com](http://www.jiqun.com)
- [註 36] 滿耕，〈人間佛教的人文關懷——從台灣「媒體環保」與「三好運動」談起〉，《普門學報》第十二期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第三一八頁。
- [註 37] <http://www.ddm.org.tw/ddmevent/ptse/heart/index.asp>
- [註 38] 關於儒家的節欲觀，參見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先生的〈儒家節欲觀的現代意義〉一文，《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九一年) 第一期。[www.guoxue.com](http://www.guoxue.com)
- [註 39] 星雲，〈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詮釋三皈、五戒及生權的內容〉，《普門學報》第三期 (二〇〇一年五月) 第一一十九頁。
- [註 40] [http://www.gmdaily.com.cn/0\\_gm/1998/01/19980117/GB/default.htm](http://www.gmdaily.com.cn/0_gm/1998/01/19980117/GB/default.htm) -
- [註 41] 張立文，《和合學概論——二十一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上、下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註 42] 美國參議員奧林·哈奇在第十屆國際法律與宗教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Senator Orrin G. Hatch, U.S. Senator and Chairman, U.S.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Speech before the Tenth Annual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igion Symposium.

[註 43] [http://www.un.org/chinese/ga/56/doc/a56\\_649.pdf](http://www.un.org/chinese/ga/56/doc/a56_649.pdf)

[註 44]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parliame.htm>

[註 45] 星雲，《迷悟之間》（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二〇〇一年三月）第一輯第十七—十八頁。  
<http://www.fgs.org.tw/master/masterA/library/center/index-a.htm>

[註 46] 荷蘭·許理和著，裴勇、李四龍等譯，《佛教征服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

[註 47] 見《中國宗教》雜誌（二〇〇三年）第三期，或 <http://pda.hkcecc.org/Article/listArticle.php?orderby=Series>

[註 48] [http://www.millenniumpeacesummit.org/mwps\\_about.html](http://www.millenniumpeacesummit.org/mwps_about.html)。